

《歐美研究》第三十八卷第二期 (民國九十七年六月), 307-361
http://www.ea.sinica.edu.tw/euramerica/ch_index.php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超越服飾改革的改革論述—— 紀爾曼的〈女性的服飾〉及其批判意涵*

許慧琦

東海大學歷史系
E-mail: rachel928@yahoo.com

摘要

本文從紀爾曼在她獨立創辦、經營與撰寫的《先驅者》月刊上連載的〈女性的服飾〉長文出發，討論她如何透過女性服飾的主題，闡述對近代美國的社會、經濟與性別的批判思想。本文指出，〈女〉文的宗旨並非只提出改革服飾的訴求，而是直指女性服飾背後的主要操縱力量，並要求根本改變。換言之，紀爾曼的終極關懷不只是女性服飾的改革，或女性身體的解放，而是女性整體社會活動的自主性與能動性。紀爾曼透過該文所闡發的批判論述，雖可能過於理想，卻也在某種程度上，將服飾改革帶往更深廣的論述層次，而發人深省。

關鍵詞：女性服飾、紀爾曼、〈女性的服飾〉、時尚、服飾改革

投稿日期：96.8.30；接受刊登日期：97.3.21；最後修訂日期：96.12.21

責任校對：陳昱之、范馨文、李珮華

* 本文初稿發表於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的「二十世紀美國史：婦女與性別」學術研討會。會前與會中承俞彥娟教授惠賜寶貴意見，並獲幾位匿名評審的寶貴指正與建議，非常感激，特此深致謝忱。

壹、前言

夏綠蒂·柏金斯·紀爾曼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1860-1935, 以下簡稱紀爾曼) 是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美國傑出女性主義者與社會學家, 她於一八九八年出版的《婦女與經濟》(*Women and Economics: A Study of the Economic Relation Between Men and Women as a Factor in Social Evolution*) 在當時廣受討論且影響深遠, 使她一躍為美國婦運界領袖 (Degler, 1966: 13-14)。紀爾曼勤於著述, 曾於歐美各地巡迴演說, 並參與多項婦運及社運活動, 備受讚譽 (Lane, 1990: 7)。¹ 雖然在她逝世後幾十年間, 其作品與思想因與當時趨於保守的主流思想有所出入而為多數人所淡忘, 但一九七〇年代第二波婦運興起後, 她的文學著作及女性主義思想再度受到重視與廣泛討論, 至今在文學、女性主義與社會學等領域仍享有盛名 (Golden & Zangrando, 2000; Hill & Deegan, 2002: 9-27)。

在紀爾曼數量豐富且種類多元的著作中, 有項不同於單一著述的成就, 即她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獨力創辦的《先驅者》月刊 (*The Forerunner: A Monthly Magazine*) (Scharnhorst, 1985)。² 該刊封面載明紀爾曼為此刊物的「作者、所有者與出版者」; 從出資、印刷、排版、編輯、單元設計等技術面工作, 到內容豐富的正文創作與論述, 舉凡小說、詩歌、散文、論文、書評、社會或政治評論, 以及給讀者的回函, 全由她一手包辦。該刊延續了七年, 而於一九一六

¹ 例如小說兼文學評論家 William Dean Howells (1837-1920) 稱紀爾曼擁有「美國女性中最好的頭腦」。當時另一位著名社會學家與社會改革者 Jane Addams (1860-1935) 則形容紀爾曼的《婦女與經濟》為「首部由女人所撰對經濟學做出真正重要貢獻的著作」。英國名記者兼小說家 Rebecca West (1892-1985) 則在一九二四年讚譽紀爾曼是「當今世界上最偉大的女性」。

² 在 Gary Scharnhorst 所蒐集整理的紀爾曼著作表中, 鉅細靡遺地列出共兩千多筆包括各種文類 (長短不拘) 的作品。

年十一月停刊。這樣的成就，在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國社會，即非絕無僅有，確也不同凡響。³ 紀爾曼在《先驅者》中發表的許多理論性與文學性創作，從她有生之年到逝世之後，陸續被集結成專書出版，可謂她闡述女性主義、社會主義與烏托邦主義思想的精華 (Gilman, 1970)。⁴ 其中，有篇刊載於一九一五年一月到十二月號的長文〈女性的服飾〉(“The Dress of Women”，以下簡稱〈女〉文)，在二〇〇二年由兩位美國社會學家合編，並加上新副標「對衣服的象征主義與社會學的批判性緒論」(*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Symbolism and Sociology of Clothing*) 予以出版 (Gilman, 2002)。⁵ 編者在緒論中，推崇紀爾曼為「美國一流的社會學理論家」，期許此書的出版，能使學界更瞭解並深入探討紀爾曼的服飾、文化與性別論述 (Eicher & Roach-Higgins, 1992: 15; Hill & Deegan, 2002: 9-23)。這篇最初連載於《先驅者》的長文，在時隔近九十年之後，以專書的形式再度出版，想必反映了紀爾曼某些重要的思想內涵。

事實上，雖然紀爾曼不曾被稱為服飾改革者，其名也幾乎未存在於史家討論美國服飾改革 (dress reform) 運動的著作中，但她曾發表過近二十篇關於服飾的文章 (Scharnhorst, 1985)。早在一八八六年十月，她便於婦女投票權運動者的機關報《婦女雜誌》(*The*

³ 另一個幾乎同時存在於美國的期刊《大地之母》(*Mother Earth*, March 1906-April 1917)，為無政府主義與女性主義者愛瑪·哥德曼 (Emma Goldman, 1869-1940) 所主編；但她並不像紀爾曼一般單獨主編 (*Mother Earth* 另一位為 Alexander Berkman) 且負責所有期刊文章的撰寫工作。

⁴ 例如 “Herland”、“With Her in Ourland: Sequel to Herland”、“The Dress of Wome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Symbolism and Sociology of Clothing”，以及 “The Androcentric Culture, or The Man-made World” 都以專書形式再度出版。最後那本在以專書出版時，其主、副標題剛好與原先在《先驅者》發表時的前後順序相反。

⁵ 在長達十五頁的緒論中，兩位編者於開頭與結尾處都說明所添之副標題在於凸顯該文精髓。

Woman's Journal) 上發表題為〈為何婦女不改革她們的服飾〉(“Why Women Do Not Reform Their Dress”) 的短文 (Gilman, 1886: 338)。此外，她的力作《婦女與經濟》一書雖未直接點名批判女性服飾，但該書所闡明的「性—經濟」批判思想，正是〈女〉文援用來揭示女性服飾問題癥結的思想利器 (Gilman, 1966: 99-121)。一九一五年開始，紀爾曼更在《先驅者》發表一連串直接間接地觸及女性服飾課題的著作：小說〈她鄉〉(“Herland”)、〈女〉文及翌年的〈我鄉中有她：她鄉續集〉(“With Her in Ourland: Sequel to Herland”)。⁶ 上述兩部小說，皆暗示女性應穿著自在並能展現自我的服飾 (Hill & Deegan, 2002: 9-27)，〈女〉文則結合學理與經驗，更深度地闡釋女性、服飾及其生活的整體關係 (Gilman, 1914: 336)。⁷ 紀爾曼在〈女〉文中，從美學、歷史、經濟學、社會學、跨文化、自然／人文現象、女性主義等角度出發，援用生物界與人類社會的諸多例證，來檢視女性服飾所指涉的性意識與性別符號，並分析與批判當時的兩性關係、社會經濟與時尚服飾。從〈女〉文的內容，可觀諸紀爾曼如何與前人的論述對話，並評論流行於美國社會的時尚文化與兩性觀。該文生動地描繪服飾的演進，其象徵意涵所顯露出的性別考量，以及時尚如何深刻影響個人與社會發展。換言之，〈女〉文是篇有關女性服飾的論述，但其宗旨並非只提出改革服飾的訴求，而是直指女性服飾背後的主要操縱力量，並要求根本改變。不論就文章所涉及女性服飾實物面的廣度、分析象徵性層面的深度，或整篇論文的長度而言，〈女〉文無疑為紀爾曼運用

⁶ 〈她鄉〉與〈女〉文同時於一九一五年一月號的《先驅者》開始連載，並皆於同年十二月刊載完畢；〈我鄉中有她：她鄉續集〉則是於一九一六年的《先驅者》連載。

⁷ 從紀爾曼在一九一四年十二月號的《先驅者》所刊登的〈女〉文預告，說明了該文企圖探討衣服 (clothes)，尤其是女人的衣服與人類生活的關係，以及服飾對人類的心理與社會演進所產生的影響。

服飾課題進行社會與性別批判的理論代表作 (Hill & Deegan, 2002: 9-23)。紀爾曼在〈女〉文中，不只鋪陳出近代美國社會女性時尚服飾與主流兩性觀的演進，也評估了她所謂「服飾改革者」(dress reformer) 的訴求及其運動成果。因此，〈女〉文除可被視為 (如二〇〇二年重新將之編校出版的社會學家所定位的) 社會學經典之外，也是瞭解近代美國女性服飾與性別文化的重要歷史文本。

歷來西方學界有關近代美國女性服飾論述的研究，已累積相當豐碩的成果，其中有的以時尚文化為主軸，討論當時社會與女性，如何透過時尚發展其文化與性別認同，表現某種現代性與批判性 (Crane, 2000; 另參見Cunningham, 2003)。這類研究包括以某種女性服飾物件——如束腰 (corset) 或燈籠褲 (bloomers) 等——為研究主體者，結合時尚理念、物質文化、服飾論述與女性主義批評，交叉呈現當時社會的主流兩性文化與性別政治，以及女性透過各種方式展現的抵拒、回應與主體性 (Fischer, 1997: 111-140; 另參見 Nelson, 2000: 21-25; Sims, 1991: 125-145; Steele, 2001; Summers, 2001)。有些以服飾改革為討論主軸，從十九世紀初期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社群，一路談到該世紀中後期的女權運動、水療運動或其他宗教團體等分別或共同提倡的服飾改革訴求 (Fischer, 2001; Kriebel, 1998)。另有部分研究近代美國女權運動或新女性的著作，也觸及與當時女性生活息息相關的服飾改革運動，並討論某些女權運動者如何努力結合服飾論述與女權理念，並賦予其性別與社會文化意涵 (Marks, 1990; Mattingly, 2002)。不過，這些研究著作鮮少提及紀爾曼的服飾論述，或其對服飾改革運動的態度 (Crane, 2000: 224-225)。⁸ 至於對紀爾曼其人其思的相關研究，雖也頗為豐富，

⁸ 雖然 Diana Crane 曾在其書中提及紀爾曼的《她鄉》中描述的女性穿著，但也僅點到為止，並未繼續討論。

但亦未見對她的女性服飾論述有專門探討者 (Davis & Knight, 2004; Golden & Zangrando, 2000; Lane, 1990; Rudd & Gough, 1999; 林淑琴, 2003: 114-131; 張小虹, 1994: 57-67; 謝謠玲, 2001: 1-13; 蘇子中, 2003: 110-148)。本文不揣簡陋, 擬拋磚引玉, 將〈女〉文置於近代美國女性時尚文化與服飾改革運動的發展脈絡中, 分析該文的論述內容與批判意涵, 以提供美國服飾文化及服飾改革史研究新的史料與視野, 並做為日後更深入研究紀爾曼的女性服飾論述之基礎。

在章節安排上, 為瞭解紀爾曼所論述與批判的時尚及兩性觀, 將先勾勒近代美國的時尚觀念與女性服飾樣式的演進, 以及與女性服飾相呼應的性別關係。其次, 將簡述紀爾曼的生平與她先前發表女性服飾文章要點, 並說明她在〈女〉文中對服飾的社會學概述, 以及兩性服飾差異的原因。進而, 第四部分以微觀的方式, 舉例說明紀爾曼析論女性服裝物件的弊端, 第五部分從宏觀的角度, 闡釋紀爾曼結合女性服飾、社會整體與兩性發展的「性—經濟」雙重批判論述。第六部分則從美國服飾改革運動的發展脈絡出發, 審視並比較紀爾曼與其他服飾改革者, 對女性服飾的改革訴求及主張的異同。最後, 結論將綜述〈女〉文所具有的批判意涵及其時代意義。希望透過爬梳〈女〉文的歷史背景、思想脈絡與文本內涵, 瞭解近代美國社會如何透過女性服飾課題, 延展出豐富的性別與文化批判論述, 並以此開啓有關紀爾曼服飾論述的研究新課題。

貳、女性時尚服飾及其表達的主流兩性觀

紀爾曼對女性服飾的批判, 源自於女性的時尚穿著, 而美國女性的時尚服飾, 則與西歐社會的時尚文化發展息息相關。西方的時尚概念與表現, 約可溯自十四世紀中葉的西歐貴族宮廷; 商業貿易

的擴張、城市生活的成長，以及皇室與貴族宮廷日增的世故複雜性，共同催生出注重外表裝扮與量身訂製的服飾觀 (Laver, 1969: 62; 另參見Wilson, 1985: 16-24)。到十八世紀，時尚的表現從宮廷與菁英階層向市民大眾傳播開來，並衍生出「跟上時代」(keeping up with the times) 的普遍性意義 (Wilson, 1985: 16-26)。人們企圖透過服裝樣式表現自己，追求社會認同，藉此提升身分地位。一言以蔽之，時尚就是迅速並持續變換風格的服飾文化 (Wilson, 1985: 1-3)。⁹ 近代工業革命的發展，促使西方的時尚服飾出現重要轉變，此尤其可見於建國未久、開始朝工業社會轉型的美國社會。工業革命推動紡織業的發展，機器大量製造成衣，使得原本昂貴的衣料價格下降，衣飾成爲人們的首要消費品 (Zakim, 2003)。十九世紀後出現的百貨公司，則促使流行服飾趨向大眾化 (Crossick & Jaumain, 1999)。中、上層階級爲了與下層民眾有所區隔並展現其財富與地位，紛紛將心思花在不斷更新服裝樣式，引發服飾風格的快速轉變 (Crane, 2000: 6-8)。英國戲劇家兼詩人王爾德 (Oscar Wilde, 1854-1900) 曾言：「時尚不過是一種人們實在無法忍受，以致於每半年就要汰換一回的醜陋形式」(Soper, 2001: 26-27)。這句時常被後世引用的名言，雖難掩譏諷意味，卻鮮明地勾勒出十九世紀西方時尚的多變特色。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多變的特色，主要展現在女性而非男性服飾上。

自十九世紀以降，西方男性服飾逐漸拋棄繁複裝飾與炫目色彩，轉而強調剪裁與合身，以呈現出不塗脂抹粉的新男性特質。有

⁹ 此處要說明的是，時尚不只包括流行的服飾款式、色彩或花樣；若從廣義的角度來看，時尚還可涵蓋音樂、舞蹈、建築、電影等題材，甚至人的言行，都有當代特有與風行的表達方式。不過本文只討論服飾，故對時尚的定義只限於服飾方面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編委會，1986: 296-297)。

些服飾史家認為，這象徵著男性退出競逐時尚的舞台，留下女性繼續置身於變動不居的服飾潮流中，與時尚維持著不解之緣 (Wilson, 1985: 28-29)。¹⁰ 該世紀中期開始出現的仕女雜誌，大量地介紹與宣傳各項時尚產品，傳達出女性與流行時尚密不可分的訊息。¹¹ 時尚服飾不僅是女性藉以表現自己的外在成品，更是形塑女性氣質 (femininity)、女人味與女性美感的重要參與者。要言之，十九世紀美國社會的兩性服飾，可說是具有「角色認同工具」(identity kit) 的功能：藉由服飾的象徵性意涵，烘托出兩性不同的特質、身分角色與責任，進而強化社會認定的性別差異 (Roberts, 1977: 554-569)。以下先檢視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期美國女性時尚服飾的演變，再說明服飾特色與主流兩性觀的關係。

從一七九〇年代到一八二〇年代的建國初期，美國上層社會女性緊追巴黎時尚流行的帝國樣式 (Empire Style)，以低胸高腰為其穿著特色。工業革命的發展，進一步強化男外女內的性別勞動分工，與男強女弱的性別特質，女性服飾逐漸強調女性柔順嬌弱的氣質，多用束腰呈現纖細的腰肢，再配以飄逸的拖地長裙 (Steele, 2001; 另參見 Plante, 1997)。¹² 裙內穿上多層襯裙以撐起長裙，予人膨脹

¹⁰ Wilson 認為，男人的新時尚表現在剪裁與合身，勝過裝飾、顏色與炫目的展示。他們放棄了女性化的化妝與綉子弟式的打扮。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男性時尚的多樣性，再現出一種比過去舊政權 (ancient regime) 時期宮廷的絲緞穿著來得更微妙、間接、複雜的展現吸引力的方式。

¹¹ 以美國而言，著名者包括 *Godey's Lady's Book* (1830-1898)、*Lady's Friend* (1864-1873)、*Ladies' Home Journal* (1883-)、*Harpers Bazaar* (1867-1901) 等。

¹² 束腰早在西元前十二、十三世紀時，於克里特島發現其雛型。近代的束腰，大致發源於文藝復興時代的貴族宮廷，在西方社會發展直到二十世紀初才消失。束腰在某些時期也為男性 (尤其是軍人、較胖的紳士或綉子弟) 所穿著，並不能算是女性服飾獨有的物件。不過到十九世紀，尤其是中期到晚期，女性時尚服飾對束腰的使用與開發，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當時男人已幾乎完全不使用束腰，使束腰成為女性服飾獨有的物件。

的尊貴感，並用荷葉邊、皺摺、緞帶、蝴蝶結、蓬蓬袖等裝飾，製造華麗的效果 (Boucher, 1987: 393-400)。一八四〇年代，染料工業技術的改進，使服飾的色澤更為鮮艷與深濃。一八五〇年代到一八七〇年代初則流行裙撐 (crinoline)，女性服飾更趨隆重與繁複，重點集中於裙子的布料與寬度 (Breward, 1995: 147-152)。新技術製出輕的鋼條以造成中空式的裙撐，使長裙呈現富麗堂皇的圓塔狀，免去穿多層襯裙的沉重感。下身裙飾的整體重量雖隨之減輕，裙子的幅度卻因寬蓬的裙撐而顯得更大，行動尤為不便。

一八七〇年代到一八九〇年代的美國女性服飾，進入「臀墊」(bustle) 時代，女性服飾的重點再度下移，利用臀墊使臀部誇張地向後膨高，點綴物有扣子、穗飾、絲帶與編織品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編委會，1986: 1052-1055)。時至十九世紀末葉，為數漸增的中產階級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參加戶外體育運動 (諸如騎自行車、打高爾夫、網球、射箭、跳舞、體操等)，促使女子服飾採納部分男性服裝的機能性設計。時尚的展現重點漸從先前強調精緻、纖細的柔弱美，轉為凸顯活潑朝氣的健美風 (Plante, 1997: 130)。最具代表性的新時尚形象，當屬插畫漫畫家查爾斯·吉卜生 (Charles Dana Gibson, 1867-1944) 筆下塑造出的「吉卜生女郎」(Gibson Girl)。其風格包括往上梳的髮型、訂做的高領襯衫式女衫，與順著自然臀形下洩的波浪形喇叭長裙，不再使用人稱「實用服飾」(sensible dress) 的誇張臀墊 (Miller, 1999: 54-56)。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女性服飾開始講究線條 (line)，尤其流行從胸線、腰線到臀線的S形線條；束腰依舊流行，以便完美呈現這種時尚曲線。直到一九一〇年代之後，引發眾人詬病的束腰才逐漸消失 (Boucher, 1987: 400-402)。¹³

¹³ 關於女性束腰引發的相關問題，參見本文第六部分。

在上述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期中，女性流行的服飾風格及其重要配件——束腰、裙撐、臀墊、緊身胸衣 (stays)、襯裙 (petticoats)、高跟鞋等——都著眼於幫助女性展示玲瓏有致的體型，或遮掩其身材缺點。女人穿束腰所營造的纖細嬌柔美感，及圓塔狀長裙所導致的活動局限性，有助於塑造與襯托女性柔弱、溫順、不事生產的特質。¹⁴ 此與美國社會自十八世紀後期至十九世紀中期陸續提出的「共和母性」(the republican motherhood) (Marilley, 1996: 5)、「純正女性」(the true womanhood) (Cogan, 1989; 另參見Welter, 1966: 151-174)，及「各自領域」(separate spheres) (Kerber, 1988: 9-39) 等主流兩性觀的建立及闡揚，不無相輔相成與互相加強的效果。基本上，這些觀念都衍生自男女各司其職、男性優於女性的理念。自從美國在十九世紀初自農業社會朝工業社會演進以來，城市的中產階級成爲社會的重心。力爭上游的中產階級男性，愈來愈強調個人事業的成功表現與財富累積，深信男人有能力撫養妻兒是件體面事，因此傾向於不讓妻子外出工作，以證明其有獨立支撐家庭經濟的能力 (Nelson, 2000: 21-25)。家庭成爲男人在工作場合打拼之餘的休憩與安身處所，妻子只需待在家中扮演爛淑妻子與賢良母親的道德守護者 (moral guardian) 角色 (Blair, 1980: 1-2)。十九世紀中葉美國內戰導致多年的社會動盪不安，更引發人們渴望回歸平靜生活，視家庭爲避難與安頓身心的天堂；人們因而更加重視女性的家庭責任及適切女性特質的養成 (Blair, 1980: 1-2)。整體而言，從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社會提倡「共和母性」，期許女性發揮母親教養後代的職責，將共和民主等公民精神傳遞給後代；到十九世紀中

¹⁴ 此指當時認爲一般女性不需要出外工作勞動，從事生產性工作。因此在服飾樣式的設計上，盡量地表現出有閒階級不需勞動的特色，即使這些流行服飾並不限於有閒階級女性穿著。

葉則傾向於強調虔敬 (piety)、純潔 (purity)、順從 (submissiveness) 與重視家庭生活 (domesticity) 等女性氣質 (Welter, 1966: 151-174; Zagari, 1992: 192-215)。社會對兩性的特質與責任有截然不同的期許，男女各司其職，各盡社會所認定的本分。

至於男性 (在生理、心理與智識層面都) 優於女性的觀點，也從女人退入家中開始，不斷被演繹；達爾文主義 (Darwinism) 的出現與流行，更強化此種論調 (Newman, 1985: 1-53)。在達爾文主義風靡美國的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美國正處於經濟急遽變動、都市迅速發展、改革思想叢生、女權意識漸長的時期 (Hofstadter, 1955: 4-5)。社會達爾文主義 (Social Darwinism) 將達爾文學說從自然科學延伸到社會科學領域，被廣泛地援用來分析與論證包括性別課題在內的社會現象與問題。查爾斯·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基於對生物界的觀察與實驗，說明性別差異是兩性為了適應或反應環境需求，而各自演化出「最有利其發展與存續」的行為及功能。社會學家赫伯特·斯賓賽 (Herbert Spencer) 將達爾文的學說從生物界延伸到人類社會，進一步闡明社會發展與性別分工，使兩性為求適應生活而演化出不同特質。他們皆深信兩性特質不僅存在差異，且男人在生理與心理方面都優於女人。因為自古以來，男人必須為了糊口與爭奪女人以延續後嗣而不斷奮鬥，因此發展出更多的氣力、智力、毅力與想像力；女人則因受到男人的保護與供養，毋需也無從開發這些特質 (Newman, 1985: 2-5)。達爾文還指出，男性祖先的性別特質只會遺傳給同性後代，女性無從透過遺傳，獲得男性的優良特質 (Darwin, 1922: 319-399, 846-891; 1958: 93-95)。¹⁵ 這般論

¹⁵ 達爾文相信，大多數特質是可以遺傳的。他同時區分了「性格傳遞」(即遺傳) 與「性格發展」的不同。這種差異對瞭解兩性不同的發展相當重要。性別特質可以透過兩性來傳遞，但卻只能在某一性別身上發展。舉例而言，女人能夠在生育過

述強化男女有別與男強女弱的概念，體現出當時社會的主流兩性觀 (Newman, 1985: 5-6)。¹⁶

不過，水可覆舟，亦可載舟。達爾文與斯賓賽的學說雖使認同主流兩性觀之人更振振有詞，但他們所闡述的演化思想，也成為反對者藉以反駁主流兩性觀的新利器。一八七二年首次發行的《大眾科學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hly*) (Spencer, 1985: 17-24)，¹⁷ 就有不少論者，其中包括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援引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論見，堅稱只要改變環境與社會觀念，讓女子接受健全而完整的教育，她們便能進化成更好的人 (Newman: 1985, 39-47, 96-104)。不過，這些知識女性雖然受到女權、民權及社會改革等思想的刺激，程度不等地要求擁有新的社會、經濟乃至政治角色，卻較少針對她們每日穿著的服飾，提出強有力的批判或摒棄那些衣裝。以受

程中，將丈夫的肌肉體格遺傳給兒子，但她們卻不會發展這樣的體格。這種平等傳遞法則，亦即「透過男女任何一性來傳遞」，並非永遠成立，不過卻是最普遍的遺傳形式。他的結論是：個人在早年生活中獲得或發展出的特質（尤其指體格等生理部分），是經由天擇獲得，並且傾向於由男女兩性來傳遞，不過並非在兩性身上都有所發展。在後來生活中成形的特質（主要是智識、理性等心理部分），則是透過性擇而來，並傾向於只傳給同性後代。

¹⁶ 達爾文認為那些被兩性分別保留下來的特質，是因為對個人生存有利，因此得以延續。斯賓賽則將自然界的演化等同於社會進步，認為所謂的自然發展就是有益的發展。因此，當他們說母性是女人「自然的」特質，意謂著這是「有利於」女性發展與生存必備的特徵。沒有母性本能的女人，就是有偏差的，對社會未來的發展有威脅。基本上，他們是根據父系社會的既有現象來考察兩性差異，得出「性別特質是根據自然法則與性擇原則發展出」的結論。

¹⁷ 《大眾科學月刊》出版時間從一八七二到一九一五年，之後改名為《科學月刊》(*The Scientific Monthly*)。投稿該刊的論者，皆廣泛援用社會達爾文主義，來討論兩性差異及其性別角色。尤其是斯賓塞刊於一八七三年十一月的〈兩性心理學〉(“Psychology of the Sexes”)，引起相當多討論。從該刊的討論內容可發現，不管認同或反對既有性別觀，論者都訴諸於科學證據，不過卻推導出完全相反的結論。

過高等教育的「吉卜生女郎」為例，即便她們換上較自在的女式襯衫與波浪長裙，裡面還是內裹束腰與多層襯裙，以維持時人眼中的美貌與時髦，並未真正解放服飾對身體的束縛 (Lurie, 1981: 222-223)。要言之，十九世紀美國社會的女性時尚服飾風格，在資本主義與消費文化的強力推進下，所注意發展與強化的，是主流兩性觀所視為「女性化」的特質，相對地忽略女性從事家務勞動或其他活動的功能性需求。主要代表當時主流審美觀者，仍為時尚雜誌的緊蕾絲束腰 (tight-lacing corset) 廣告所再現的姣好身材，及其優雅體態 (Steele, 2001: 35-175)。

束腰堪謂最能具體表現十九世紀美國女性服飾風格與主流兩性觀的物件，它讓女人得以呈現完美體態、端莊儀姿與誘人曲線，使許多自認為體型不佳、身材走樣的婦女，自覺可以變得更美、更見得了人。在主流兩性觀與時尚美學的催眠下，束腰的社會功能不斷被強化，其穿著對女體產生漸增的弊端與危險。此一女性私密物件，便在時尚文化的大力宣揚，與其相應弊端不時可聞的兩極拉距之間，成為當時美國社會各界的討論與爭議焦點。人們從健康、優生、醫學、美學、女權、時尚等角度出發，交織出眾聲喧譁的束腰論述 (Summers, 2001; Steele, 2001)。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時尚風格的設計理念與服裝款式多由男性主導，女性卻非全然被動或被迫地穿上束腰這般時尚內衣；她們當中，不乏有人企圖運用社會所接受的方式——穿緊蕾絲束腰與高跟鞋等以展露曼妙身材——來表現其性自主 (Crane, 2000: 99-100)。對這些女性來說，既然社會不讓她們像男人一樣受教育、就業、養活自己，她們就竭盡所能地透過服飾來表現自己，以迎合或滿足男人的欲望，並在其他女性的豔羨或嫉妒眼光中，獲得愉悅的滿足感 (Steele, 2001: 35-36, 87-111)。

綜上所述，近代美國女性時尚服飾的演進，大致反映了男女有

別、男外女內與男強女弱的主流兩性觀。話雖如此，女性時尚服飾與主流兩性觀，並非總是天衣無縫地唱和著。有些認同主流兩性觀的論者，曾大力批判女性的時尚服飾樣式；另有些質疑主流兩性觀的女權運動者，也嘗試改變自己的服飾，卻受到始料未及的阻力，只好回復符合主流的時尚穿著。¹⁸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美國社會各界的改革聲浪絡繹不絕，批判女性時尚服飾的言論也紛至沓來。不論這些眾聲喧譁出於何種動機與考量，近代美國的女性時尚服飾與主流兩性觀交織出的微妙互動，適足以讓吾人一窺美國社會性別文化的複雜面貌。紀爾曼的〈女〉文，結合女性服飾與主流兩性觀的發展，指出女性服飾的弊端，正是主流兩性觀的缺陷所在，因此有必要做全盤的改變。本文第三部分，將敘述紀爾曼如何詮釋服飾的社會意涵，與兩性服飾差異的意義，以瞭解她如何定位服飾的功用、及其對女性生活的影響。

參、紀爾曼對服飾的社會學概述

紀爾曼是一位活躍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美國社會的傑出理論家及社會評論者。她從小因父親離家，隨著母親生活在不斷搬遷且寄人籬下的陰影中。家庭經濟拮据雖影響紀爾曼受教育的機會，但艱困的環境，反刺激她求生與求知的鬥志，不斷自修以吸取各類知識。雖然父親早年離家，但父親家族（即美國史上知名的批茶 [Beecher] 家族）中幾位傑出女性——包括撰寫《湯姆叔叔的小屋》 (*Uncle Tom's Cabin*, 1852) 的哈芮特·批茶·史道蕙 (Harriet Beecher Stowe) 以及女子教育家凱薩琳·批茶 (Catharine

¹⁸ 有關批評女性服飾並提倡改革的主張，皆可納入十九世紀前期以降的「服飾改革」潮流中。其相關發展與倡議者的改革動機，請見本文第六部分。

Beecher)——關於女權與人權運動的論述，則啓迪了她的女性自覺與社會關懷意識。她在因寫作而成名前，曾當過老師、家庭女教師、業餘的商業卡片畫家。一八八四年，她與一位藝術家查爾斯·史戴生 (Charles Salter Stetson) 結婚，未料卻開始為憂鬱症所苦；生下女兒凱薩琳 (Katharine B. Stetson) 之後，更無法停止憂鬱與長期的哭泣。最後，紀爾曼與丈夫離婚，並帶著女兒到加州展開新生，也開啓日後精彩而多產的創作與巡迴演說生涯。一九〇〇年，她與小她七歲的律師表弟喬治·紀爾曼 (George Houghton Gilman) 再婚，此後繼續寫作，且因希望不受拘束地全面闡述自己的思想，在一九〇〇年獨力創辦《先驅者》月刊並擔任所有文章的撰寫工作，到一九一六年底因財務問題而停刊 (Gilman, 1991; 另參見 Lane, 1990)。她在一八九〇年代便因《婦女與經濟》一書的出版而聲名大噪，此後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她的女性主義思想與社會批判，備受美國社會矚目與討論 (Degler, 1966: 6-35)。一次大戰的開始與結束，將美國社會及女權運動的發展帶進另一個階段；戰爭雖使婦女得以從事多項以往不被允許的工作，並間接促成美國婦女投票權的通過，卻也逐漸消弭戰前美國社會蓬勃發展的進步 (progressive) 思想與改革熱情。戰時的緊繃情勢在戰後迅速瓦解，社會開始出現各種逸樂甚至放縱的行徑，年輕而摩登的女性更成為自我解放的重要代言人 (Fass, 1977)。¹⁹ 紀爾曼不認同這些現象，尤其不滿新生代女性只知自我享受卻喪失女性前輩爭取女權的信念與改革社會的理想 (Gilman, 1923: 731-737)。不過紀爾曼的批評抵不過社會潮流的改變；她的時代已然結束。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七日，已罹患乳癌多年的紀爾曼，用氫仿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Degler, 1966: 6-35)。

¹⁹ 年輕女性在那時開始效法男性而從事的享樂行為包括抽菸、喝酒與跳舞等。

紀爾曼是個創作數量驚人，且論述面廣泛的作家與社會學家。在女性課題部分，只要有礙女性身心自然發展的各種人、事、物或制度，幾乎都是她批判的對象，因此很難無視於時尚服飾對女性身心造成的種種箝制。如本文前言所述，紀爾曼早在一八八六年便開發表〈為何婦女不改革她們的服飾〉一文，以千餘言提綱挈領地點出，婦女寧可忍受衣著所帶來的諸多身體不適，也不願與社會主流對抗，以致斷送自己的婚姻前途（1886: 338）。一八九一年發表的〈服飾與身體〉（“The Dress and the Body”）短文，則嘲諷服飾文化已發展到反客為主的地步，由女人的身體各部位盡量調整以配合美麗的服飾，例如用各式帽子來遮掩不夠好看的頭形，棉花襯墊修飾斜肩或過平的胸部等。換言之，女體成了名符其實的穿衣架，身體的存在，是為了（經過不斷修整才得以）撐起美麗的衣裝。她慨嘆道，對人們與那位穿著美麗衣裳的女子自身而言，「那身衣飾，而不是她自己的身體，才是他們眼中的女子」（1891: 6）。紀爾曼的成名作《婦女與經濟》，關於服飾的論述倒是不多，僅在第五章簡短批評束腰對人體及其行動所帶來的不便（1966: 77-78）；不過該書的重要論點，即「性—經濟」雙重批判，則成為〈女〉文著力發揮的批判論述核心。²⁰

到一九〇四年時，紀爾曼發表另一篇短文〈孩童的衣服〉（“The Clothing of Children”），指出當時的女性舉止應像個「淑女」的主流女性觀，使她們的女兒也穿上不合宜的服裝，而成為女性錯誤選擇的犧牲品（1904: 338）。翌年，她又撰寫另一篇題為〈服飾的象徵主義〉（“Symbolism in Dress”），說明文化、習俗、性別觀等象徵意涵如何主導與影響人們選擇服飾樣式，甚至不顧衣服的功能性，例如硬是讓事務繁重的家庭女傭得穿上行動不便的長裙做事等等

²⁰ 相關討論，請見本文第五部分。

(1905: 1294-1297)。由此可知，紀爾曼對女性服飾的種種問題，實有著長期的多方觀察與深刻體驗，且發表過多篇短文略述己見。她在一九一五年撰寫連載長達十二期的〈女〉文，並非突如其來的隨意之作，而是有意全盤地針對女性服飾的主題，暢所欲言地詳細論說，以求廣而深地觀照女性服飾與其人生的全面關係，並展開其社會學批判。²¹

紀爾曼在〈女〉文一開始，便對服飾做出社會學式的導言，其立論乃奠基於前人的研究與分析結果之上。十九世紀以降，某些西方學者秉持科學研究的精神，探索衣服的起源、意義及其性別意涵 (Eicher & Roach-Higgins, 1992: 8-28)。時至十九世紀中葉，美國學界針對人類穿戴衣物的動機，大致發展出三種理論：一是得體論 (the modesty theory)，主要以舊約聖經中的《創世紀》(*Genesis in the Old Testament*) 為依據，從亞當與夏娃受誘惑吞食智果而生羞恥心，說明穿衣是為為了遮羞。二是保護論 (the protection theory)，表示人們穿衣是為為了保護身體不受外在自然環境的侵襲。三是裝飾論 (the adornment theory)，指出原始部落民族喜在身上刺青與彩繪當做裝飾，以與他人區別並辨識身分；這種原始欲望甚至早於禦寒的穿衣動機，可謂僅次於饑餓就想覓食的生理本能 (Rubinstein, 2001: 19-33)。〈女〉文大致承襲與綜合上述研究成果再加以衍申，全面地檢視服飾與人類社會生活的互動，並發展出她獨特的批判論述。

〈女〉文第一句「衣料是層社會的薄紗」(Cloth is a social tissue)，開宗明義地界定，服飾是人類為適應群居生活而發明的物件

²¹ 該文對女性服飾課題的論述面之廣，可從全文十二個章的名稱略窺一二：第一章、著衣的原始動機；第二章、某些修正的力量；第三章、所牽涉的原則；第四章、身體健康與美麗；第五章、美麗 vs. 性差異；第六章、帽子；第七章、裝飾的藝術、附加物與飾品；第八章、人道與經濟考量；第九章、較大的經濟考量；第十章、稱之為時尚的力量；第十一章、時尚與心理學；第十二章、希望與安慰。

(Gilman, 1915a: 20)。文中將人們穿衣的動機與功能歸納為五項：一、保護 (protection)；二、保暖 (warmth)；三、裝飾 (decoration)；四、合宜 (modesty)；五、象徵意義 (symbolism) (Gilman, 1915a: 20)。紀爾曼真正著力論述的是後兩項；她指出正是這兩項功能，使人類的服飾有別於其他生物的外表 (包括毛、皮、鱗片、短鬃髮等)，並充滿人為及主觀詮釋、制約與價值判斷的痕跡：

透過可變性與多樣性，我們的衣物已經成為一種媒介。我們有情緒時，皮膚會泛紅、變白、收縮到毛髮豎立；但是有了衣物後，我們得以表達從虛榮心到社會意識的所有情緒。(1915a: 20)

紀爾曼表示衣服的製作、穿著與選擇，刺激人們自我表現與融入社會的欲望；然而這種欲望常超越個人控制的範圍，並被轉化為社會約束個人的權力運作機制。衣物做為「非人類與生俱有，卻是社會組成不可或缺」的要件，「可能是多餘的、有害的，或造成某種疾病與危險」(1915a: 20)。在此，紀爾曼已埋下伏筆，暗示服飾可能對女性帶來的負面影響。她首先透過詮釋合宜這個概念，來說明人們如何用「任意專斷的聯想或聯繫，來充滿我們的心智世界，界定什麼是神聖、高尚的，什麼是禁忌」(1915a: 23)。她特別強調合宜的社會行為規範，對女性造成的箝制作用。例如，當男人接近一位未婚女子時，後者因對方是異性，而垂下眼簾或臉紅害羞，這便是社會認定的合宜舉止 (1915a: 23)。而除了行為舉止以外，女性的穿著服飾，更是用來表現「合宜」與兩性差異的重要工具：

男人的衣著隨著身體情況而修改。
女人的衣著則是隨心靈情況而修改的。她們被限制在特定領域中，沒有人在乎她們舒適與否，因此在女人的服飾上才有可能還維持早被男性服飾拋棄的原始情況。(1915a: 23)

當時女性服飾的樣式與風格，反映出社會對女性行為的諸多限制。即使自十九世紀以降，紡織業、布匹業、染料業、成衣加工業不斷發展，裁縫技術與設計美學也持續進步，女性服飾的樣式，卻仍受主流社會所認定的合宜框架所束縛。其不合理的程度，可從「一個女人展示其頸項、手臂與肩膀、背部與胸部就是『合宜』的，而沒穿襪子就去海邊或河邊玩水是『不合宜』」得知 (Gilman, 1915a: 23)。紀爾曼清楚地指出，對女性服飾的諸多要求，幾乎完全集中在「極致顯眼地表現女性特質」這個核心概念 (1915a: 23)。換言之，談到兩性的服飾，就不能忘記男女有別的合宜區隔；而且，這個合宜的標準，又是以限制女性的穿著為中心而制定的。諸如女子一定要穿長裙，服飾要比男人的更輕薄、柔軟、鮮艷、更具裝飾性等，讓人得以清楚判別兩性的涇渭分明 (1915b: 51)。透過界定與規範女性的言行及服飾以確保性別差異，其意義類似於早期白人對黑人的歸類與規範。亦即，女性藉由服飾所展現的性別特質，是男人所不會有的；就像被白人視為較低等的黑人，其言行不為白人所認同。女人是男人的他者 (other)，就像黑人是白人的他者 (江勇振，2004: 39-67)。因此，社會對兩性服飾的要求存在巨大的落差：

男人的服飾 (即使還殘留某些過去光榮的痕跡) 最主要的，還是以符合其生活中的經濟活動需求為主。
女人的服飾則不是如此。其服飾中根深蒂固的性別差異 (sex-distinction) 概念凌駕了最不應忽視的經濟活動需求。(江勇振，2004: 48)

十九世紀之後，新的工業經濟型態與社會轉型，提供美國男性在經濟與政治領域更多的發展機會；為因應新的社會身分與工作需求，男裝不斷調整質料與樣式。舉例而言，男性工人的衣服質料與顏色，開始強調耐洗、耐磨、耐髒，樣式則著重於符合工作所需，

朝簡單統一的方向發展。女人的服飾則否。以家庭收入中等的主婦常穿的印花棉布上衣與圓蓬長裙為例，其價格雖然便宜，卻對主婦們升火煮飯、汲水打掃、上下樓清理家庭等家務勞動，造成諸多的不便與危險 (Gilman, 1915b: 47-48)。紀爾曼並未否認女性服飾樣式，已因時代的演進、觀念的漸變與新興商業力量的推導，有某種程度的調整，但她強調的是，「不肯鬆手的舊影響力」，仍主導著女性的切身衣著 (1915b: 48)。她認為主流兩性觀的強大勢力，掌控了女人的服飾走向；相反地，男性服飾則否：

當你看到一群男人時，他們主要是因為個人特質而讓他們與眾不同。你可以看到（男）人。你看得到的他們的臉，他們的頭形，他手的特色。如果他是英俊的，你所欣賞的正是他本人；而不是一堆由髮飾、服裝、羽毛、緞帶、珠寶，或面紗等堆砌起來的一團大雜燴。(1915b: 49)

甚而有之，這種由女性打扮得花枝招展來吸引男性的表現，恰好與大自然其他生物的情形相反。綜觀生物界中雌雄物種的表現，舉凡鬃、冠、肉垂、尾端羽毛、炫目色彩這類「歡樂而蓬勃有力地展現其性別特質與吸引力」的裝飾，都是雄性生物所特有 (Gilman, 1915f: 163)。紀爾曼認為人類社會由女性巧扮裝飾以取悅男性的行為，是種顛倒陰陽的不自然現象 (1915b: 50-51)；在服飾世界裡，主流價值觀的人為運作，怪異地扭曲了兩性特質：

女人凸顯女人味且高度盛裝的服飾，似乎是與其女人的身分做了認同……然而實際上這些多餘的裝飾努力，其本質是男性化的 (essentially masculine)。我們的女人，臉上塗的化妝品、身上戴的首飾與裝飾，其行為已變得雄性化；而我們的男人，穿著那些令他們滿足、耐用又不引人注目的材質衣物，則反倒女性化了。(1915e: 135)

紀爾曼指的是女人爭奇鬥妍的服飾競爭，就像雄性生物一般地陽剛且熱中表現，男人在重視實用與簡潔的穿著中，則顯得柔順而甘於平淡 (Woolson, 1875: 230-231)。她認為兩性在服飾上表現出的差異，正是社會不健全與壓抑女性的重要癥兆。這種生動而戲劇性的論述策略，雖得以鮮明地對比出兩性在服飾上的極端差異，卻在分析服飾樣式與穿著選擇時，過份地褒男貶女且加深兩性區隔。實則男性雖在十八、十九世紀之交，因應工業革命的演進與工作需要、改革政治理念的闡揚、浪漫主義信念的發端等因素，逐漸放棄原先較誇飾的化妝與紈袴子弟式的打扮，但他們並未完全退出競尚時尚的舞台。此後男性的新時尚風格，主要表現在剪裁與合身上，不再強調過往那種裝飾、顏色與炫目配飾 (Wilson, 1985: 28-34; 另參見安妮·霍蘭德，2000: 116-124, 169-170)。換言之，男裝並非完美無缺，如漿燙硬挺的衣領、束縛脖項的領帶、過於剪裁合身的衣褲等設計，仍不見得適合男性不同場合的舉止與活動。但在紀爾曼眼中，男裝的規格化，卻遠勝女裝不只浪費且有礙身心健康的服飾競賽。為求對女裝的弊端有更具體的說明，她在〈女〉文中列舉三種女性衣物，分析其如何局限女性的身心靈與社會發展。

肆、〈女〉文所舉女性服飾三害——束腰、長裙與鞋子

〈女〉文第三章「所牽涉的原則」(The Principles Involved)，以束腰、長裙與高跟鞋子這三種物件，說明服飾如何全面性地影響人類生活。紀爾曼開頭先揭櫫人類生活的四大本質與目的，以此做為觀察與評論女性服飾所依據的判準：一、生活就是成長與行動；二、人類的生活由個人與社會兩大層面共同組成；三、個人層次要求個人關係的自由成長與充分活動；四、社會層次要求正確的社會關係得以自由成長，並能從事完整的社會行為 (1915c: 75)。她以某位穿

著過緊鞋子的年輕男性為例，說明這雙不合腳的鞋，可能阻礙他的個人成長，妨害人際互動（因為他走路的笨拙模樣，很難討好心儀的女孩），減緩社會關係的成長。他可能因此無法與朋友愉快地相處，甚至喪失原本可得到的就業機會，而降低他在社會行動的價值。由此可知，男人的一雙鞋除了耐用、防水、禦寒、耐磨等機械用途之外，還可能影響其交友、個人心態與想法、責任的完成、雇主的態度，及他對社會的貢獻程度（1915c: 75-76）。

紀爾曼以年輕男子與一雙過緊的鞋子之間的互動為例，勾勒出服飾在個人與社會、身體與心理、實用與美學等層面可能具有的深遠影響。她瞭解當社會組織與人際關係愈趨多元時，主導人們選擇服飾的動機，也會變得複雜甚至互相牴觸，所以主張穿衣應有其首要原則與考量順序（1915c: 76）。²² 其中，她特別強調身體健康與行動效率是最不應被犧牲的基本原則。從這樣的前提出發，紀爾曼開始逐項剖析束腰、長裙和鞋子的弊病，以論證不健全的服飾，如何使美國這個自稱為文明國家中的女性行動遲緩、舉止彳亍、軟弱盡現、搖搖欲墜、做事無效率。

束腰大概是西方服飾史上引發最多爭議的衣著物件（Summers, 2001）。研究束腰史的當代學者薇拉蕊·史蒂爾（Valerie Steele）指出，十九世紀美國社會各階級女性都穿著束腰；雖然不同階層的女性所使用的束腰樣式與價格落差甚大，追求流行時髦的愛美動機則大同小異（Steele, 2001: 35-65）。紀爾曼在〈女〉文中，並沒有一味

²² 紀爾曼再舉鞋子為例，說明由於社會職業的分疏化以及對相應職業穿著的要求，使男人不能選擇較為舒適的（原為北美印第安人穿的）軟皮平底鞋（moccasins）或是（用絨氈做的）室內男用拖鞋，而必須穿著較硬的漆皮鞋去上班。這是因為他生理上的舒適感被工作場所受到的否定所抵消，因此他寧可穿著漆皮鞋去上班。換言之，人們選擇某些衣著物件，其動機在文明社會中益趨複雜，有時反而犧牲了最基本的原則。

地斥責束腰的不是。她承認早期束腰的用途是輔助身軀，不會影響女性肌肉骨架的發展，而且只要不綁得緊到影響呼吸或阻礙胸部發育，對身體並無害。但她著重凸顯的是，十九世紀以來束腰樣式變相地畸形發展，以致於女人若不穿束腰，好像沒有脊椎站不直一般 (1915c: 79)。女性背部與腹部的肌肉，被緊蕾絲與撐條共同有力地包覆與支持著，長期下來因缺乏運動與使用，而容易退化、萎縮。這在紀爾曼眼中，無異於慢性自殺。她半感慨、半開玩笑地表示：「由男士幫女士揀手帕的紳士行爲，正源自於女人穿著這身物件，因為『女人不好彎腰』。其實不是女人難以彎腰，是女人身上的束腰讓她們彎不下去」 (1915c: 79)。

若說紀爾曼還承認束腰本有某種治療與保健功能的話，她對於女人所穿的長裙，則沒有任何正面評價，因為不論從長度、寬度與繁重的襯裙掛在腰上的重量來看，長裙都是女性活動的阻礙與負擔。她拿自己曾看過雪地滾馬鈴薯比賽的動畫影片為例，說明片中的男人行動便捷迅速，女人則受限於其長裙而遲鈍蹣跚，卻仍被讚為「優雅」 (1915c: 79-80)！她感慨社會透過種種服飾，把女人包裝成有「女人味」的性別，讓後天的社會養成，內化進每個女人心中；事實上，那種穿長裙的走路姿態並非女性所獨有，如果男人也穿上長裙，一樣也會那般地行動不便 (1915c: 80)。

至於當時流行的女鞋，同樣被紀爾曼視為女人肉體折磨的來源。她強調雙腳是人類移動與運動的基本引擎，讓人們得以站立、行走與跳躍，承受人體重量與負載人們各種行動的作用力，並迅速變換姿勢與速度。因此，任何有礙雙腳發揮這些功能的物件，都是不適當的。她抱怨道，雖然男鞋也有某些構造上的問題，但女鞋更多出兩種顯而易見的嚴重問題：一是鞋尖對腳趾頭的極端緊縮與壓迫，另一則是對身體行動「不可原諒的虐待行爲」，即高跟鞋 (the

high in-sloping heel) 的發明與穿著。紀爾曼同意在符合人體工學的程度內，有適當高度的鞋子是合宜的。但是「把高度提高成那樣，等於把腳整個弓起來，不是讓腳跟、而是讓腳背來承擔人體的重量，是功能上的傷害 (1915c: 80)。

對束腰、長裙與鞋子逐一檢視與抨擊之後，紀爾曼綜述這些物件對女性身體、心理、行動自由及社會參與的負面影響：

它們（註：指這些物件）成功地將高貴的、強壯的、挺立的、靈巧的、有能力的、持久的工具——人體——改變成可憐的、虛弱的、彎曲的、不穩定的、遲緩的、缺乏效率的、容易疲乏的東西。(1915c: 81)

她感嘆女人總被要求穿長裙，服飾要輕薄、柔軟、鮮艷、裝飾性強；人們只看到女人穿著這些服飾的光鮮亮麗外表，卻鮮少正視這些衣著對她們的行為、勞動或健康可能造成的危害。說穿了，長裙是穿給男人看，是為區別兩性差異，對女人並無益處 (1915b: 50)。結果原本具有高度行動效能的人體，被這些物件所役使，變成拙劣可笑的不發達物。歸根究柢，紀爾曼認為，女性服飾樣式與物件的缺陷是結果，父權社會及兩性關係所交織出的生活網羅，才是壓抑女性的根本原因。

伍、打倒「時尚暴政」——紀爾曼的「性—經濟」雙重批判

在紀爾曼眼中，女性的時尚服飾，是個設計巧妙與精心呈現的文化載體，廣泛涉及以中上階層為主流所建構的社會價值與性別秩序、社會性別差異與勞動分工、紡織與製造業生產，以及相關產品的行銷運作。紀爾曼稱呼這種透過服飾對人們造成類似集體催眠的

強大魔力，是為「時尚暴政」(the tyranny of fashion) (1915l: 329)。²³ 時尚的權力來源，是性與經濟互為作用所滋生的力量，亦即主流兩性觀，以及形塑此種價值觀的社會與經濟機制。此乃紀爾曼的「性—經濟」(sexuo-economic) 雙重批判論述：女人在現有的社會與經濟框架中，無法自立更生，只能倚恃自身的性別特質來吸引男人；其中，女人的性魅力，最能擄獲男人來供養她們。質言之，女人充分開發性誘惑的力量，在於求得經濟滿足。

紀爾曼在一八九八年出版的《婦女與經濟》一書，即已分別說明性關係 (sex-relation) 與經濟關係 (economic relation)，以及二者的關聯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性關係是個體之間的肉體與靈魂的交流，「最初與最終都是個人的」；相對地，經濟關係雖然一開始是個人的，卻在社會演化的過程中，逐漸變成集體的 (1966: 105-106)。紀爾曼抨擊當時的社會，將屬於個人的性關係與集體的經濟關係做了不健全的結合，遂造成諸多的弊病與遺毒。性關係應屬於個體彼此的平等結合，不應滲入經濟的考量，否則便可能受經濟優劣勢的影響，出現兩性權力的不平等乃至於剝削。這樣的情形在娼妓業的發展中，最明顯可見 (1966: 106)。紀爾曼認為出於私利的經濟顧慮與算計，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性關係，使女人受困於男人的權力羅網之中。她們被禁止生產，但被鼓勵消費：

做為消費者的女性，被排除在自由生產的行列之外……她的消費主要只限於與肉體歡娛 (physical pleasure) 有關的事物，為感官或美感的裝飾，以及個人美化創造出一個奢侈而萎靡的市場來，善變而錯誤地供給著相關物品，其運作對真

²³ 對時尚的強大魔力，紀爾曼曾有如下描繪：「當到處都是戴著大到可以把女人從眉毛到肩膀都蓋住的那種白痴帽子的女性，慢慢地，旁觀者就覺得順眼，甚至看不習慣以前那種正常樣式的帽子，而將其貶為像侏儒戴的不正常帽子。」

正的工業與純真的藝術造成了致命的打擊。(Gilman, 1966: 120)

紀爾曼表示，這種「性—經濟」的有害聯繫，「將我們的產業關係性欲化，而將我們的性關係給商品化了」(1966: 121)。〈女〉文中延續並發揮上述論見，直指女性服飾是此一聯繫的最大幫凶；女人的穿著，把她們緊困在性玩物的角色扮演中。在父權社會的體制與價值觀的運作下，女人為求適應環境，「將性吸引力發展成一門無與倫比的精緻藝術」(1915i: 248)，因為「她們必須依賴男人來養活」(1915e: 134)。質言之，女人最重要的職志，就是取悅男人，以求生存：

不管女人在家中從事什麼樣的勞動，總發現討好男人是主要經濟利益來源。透過男人，女人可以得到財富、享樂、社會地位與家庭。(1915b: 50)

由於女性承受性與經濟的雙重壓力，所以「當男人在經濟與政治生活中充分發展出各種不同的關係時，女人仍舊集中於與性有關的關係」(Gilman, 1915a: 23)。女性生活在主流審美觀與女性觀的社會氛圍中，被教導取悅男人的訣竅，並穿上充滿女性特質與性吸引力的服飾。然而，若只是女性因經濟劣勢的需求，企圖透過服飾來凸顯性意味，尚不足以形成如此強大而普遍的服飾潮流。究其根本，紀爾曼認為主要癥結，在於資本主義社會中，不斷被鼓動與膨脹起的男性欲望。

紀爾曼並非是最早提出「男人透過女人 (的服飾) 來展現自己」的社會經濟學觀點之人。索斯坦恩·韋伯倫 (Thorstein Veblen, 1857-1929；以下簡稱韋伯倫) 在一八九九年出版的《有閒階級理論》(*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已精闢地闡述了此一見解

(Hill & Deegan, 2002: 9-23)。²⁴ 該書以整章的篇幅分析服飾——主要是女人的時尚服飾——為何及如何與中上階層創造的新式消費文化同步發展 (Veblen, 1934: 167-187)。韋伯倫所定義的有閒階級，在經濟上的重要特徵是勞務的免除 (exempt from industrial employments) (1934: 1-21, 43, 57-58, 293-331)；²⁵ 與其相對的，則是勞動階級 (working class) (1934: 1-2, 22-23)。²⁶ 有閒階級的出現與所有權 (ownership) 的創始一致，主要的動機是競爭。在蠻族時代，主要的競爭手段是武力與戰事等掠奪行徑；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後，則以金錢財富做為衡量能力與輩份的標準。不論是早期或近代社會，有閒階級男性從事的競賽，都與女人有關。韋伯倫指出最初所有權的表現形式，是男人擁有女人，進而擴及擁有她們辛勤製造的產品；男人透過競爭占有女人，展現的是對「物」與對「人」的兩種所有權 (1934: 1-2, 22-23)。在蠻族文化中，女人是男人掠奪行為的戰利品，是男人英勇事蹟的明證；到了近代社會，女人仍是男人競爭占有來組成家庭的戰利品 (1899: 503-514)。²⁷ 尤有甚之，有閒階級男性為了彰顯有閒的本事 (prowess)，遂將妻子與家中僕役，當成展示自身地位與消費能力的戰利品。身為妻子的貴婦人，

²⁴ 韋伯倫與紀爾曼在思想上有某種程度的交流及相互影響。在韋伯倫的《有閒階級理論》中，可發現紀爾曼較早出版的《婦女與經濟》所表達的思想意涵；而紀爾曼之後所寫的〈女〉文，則直接點出韋伯倫之名並援用其《有閒階級理論》的見解，以增強自身的批評論述力道。

²⁵ 應予說明的是，韋伯倫所謂的勞力或勞動，是指在公領域的受雇生產性勞動；因此，中產階級家庭主婦的家務勞動，不能算在「勞力」之內。

²⁶ 根據韋伯倫的說法，有閒階級與勞動階級的分野，從蠻族時代開始，即與男人及女人工作的區別有密切關係。早期的有閒階級男性從事的主要活動，包括政治、戰爭、宗教與狩獵，女人則擔任各種較無價值並低下的手工勞動。換言之，有閒階級指涉的只有男性。

²⁷ 此種占有女人組成家庭的婚姻制度，韋伯倫以「所有權婚姻」(ownership-marriage) 名之。

特別能替代其男人消費 (consume vicariously for men)，間接地男人享有炫耀性消費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的快感 (Veblen, 1934: 35-67)。貴婦人的服飾樣式，因而多展現出不事／適生產的特質，以強調她們不只有奢華衣裳可穿，亦毋需從事僱傭性勞動，甚至有僕役與醫生可隨侍在側 (Veblen, 1934: 167-187; 另參見Nelson, 2000: 21-25)。

紀爾曼發揚韋氏的觀點，指出「現在的男人，不再費力地像雄性動物一樣發展鬃、冠、肉垂，或尾端的羽毛，不再穿上絢麗的服裝，而改在他們的女人身上，展現自己」(1915e: 136)。緣此，女人可以穿戴比男人更多而炫耀奪目的珠寶，一來由於「女人所攜所顯的，都是這個家的財產」，二則因男人「有種想提升其女性財產的美與價值的欲望」(1915g: 192-193)。在金錢競賽的動力驅使下，有閒階級男性「將其妻的衣服與裝飾，當成不只是耳目之娛、更是展現財富的最大工具」(1915g: 192-193)。在紀爾曼眼中，女性對自身服飾的積極與渴望，是受到經濟無法獨立的因素所驅使；相對地，時尚女性服飾折射出的男性欲望，是男性彰顯自己的經濟能力。箇中差異正凸顯出她所謂「性—經濟」機制的不當運作對女性的雙重桎梏。在《婦女與經濟》中，她已敏銳地觀察到，女人「靠著得到一個丈夫來維生」，男人則「靠著生計與收入來得到一個妻子」：

對她來說，有丈夫就是她的經濟優勢。而對他而言，維持經濟收入就是他的性優勢。在她身上，性功能 (sex-functions) 已經成為經濟功能 (economic functions)。而經濟功能，則成為他的性功能。(1966: 110)

紀爾曼曾表示，若由女性選擇較優男性成為伴侶的話，這種健全的「性擇」(sexual selection) 過程將有助於種族改善，可惜當時

西方社會的婚姻制度，卻非良性的男人性競爭，反倒以買賣婚 (marriage by purchase) 的型態進行。男人尋求配偶的性競爭由於摻入了經濟考量，導致許多男人並非因身心健全、體魄強健或人格高尚等優異條件贏得伴侶，而是因經濟優勢而得娶妻 (Gilman, 1966: 110-111)。至於女性，雖然可運用性魅力或性別特質，確保往後的經濟利益，但這卻相當不利於她們的身心與社會的健全發展。概言之，紀爾曼堅信性與經濟兩種關係的互相運作，使男人占盡便宜，女人則飽受局限。當時女性彼此的競爭，絕少是求學術或社會表現，而是為了爭取男人的寵愛 (1915e: 135)。這種將心思放在取悅男人，沉迷於時尚遊戲的女性表現與自我認同，是紀爾曼所不樂見的。她無奈地表示，競逐時尚的虛榮舉措，不僅無益於女性的心智發展，甚至使她們將「社會」的意義扭曲與窄化為一群人吃喝玩樂、跳舞打牌的一種娛樂形式 (a form of amusement) 而已 (1915c: 77)。

紀爾曼的「性—經濟」批判，及其所承襲的韋伯倫的「炫耀性消費」觀點，基本上都建立在某種論述前提上：即當時的女性無論在身心或經濟上，都全然地被社會所宰控與制約。因此，紀爾曼毫不猶疑地，將女性主動且積極地參與時尚服飾競賽、挖空心思展現性吸引力的表現，全盤認定為係受男性中心的主流兩性觀催眠下的內化行爲。在紀爾曼的「性—經濟」批判論述中，女性幾乎不具有選擇服飾的自主權與智慧。此種趨於極端的認知，促使紀爾曼容易忽略當時確有女性可能自覺地意識到現實環境的條件與局限，而在服飾穿著上做出某種權宜考量與妥協。只不過，即使當時愈來愈多受教育的女性，在家庭、職業與社會活動各方面，嘗試漸進地突破主流兩性觀對女性的限制，她們依舊不變的束腰長裙等穿著，在紀爾曼眼中，就是不夠覺醒的證明。她認為那些緊繃絆腳的女裝，正

是男人瞧不起女人、視女性為弱者的重要根源。對此，她也援用了達爾文主義的觀點加以論證。她同意達爾文與斯賓賽的結論，即性別特質乃兩性為適應環境，而發展出最能利己生存的行為，但她不同意此說法足以論斷女性是較弱的性別。正如前述紀爾曼辯駁並非女人彎不下腰，而是她們穿的束腰在作怪，她再度聲明「那些被斷言『軟弱無力』(feebleness)、先天能力不足的女性特質，大半要歸因於她們穿的衣服帶來的障礙與束縛」(1915c: 79)。對紀爾曼而言，虛榮這種心態，「從神氣活現的雄鹿到趾高氣昂的公雞都可看出，其本質屬於雄性」(1915e: 136)，絕不是女人專有的特質 (1915e: 137)。多數女人之所以臣服於時尚，是因她們無法打破性與經濟交織的雙重網羅。當有閒階級男性炫耀自身財富的欲望不斷膨脹，其他階層人士為求提升身分地位也競相仿效，兩性又處於「男人為女人供給者」的病態關係 (morbid relation) 時，女人的時尚服飾，便成為兩性欲望的最佳表演舞台。此種兼具女性主義與社會經濟學思想的雙重批判，使紀爾曼的女性服飾論述，有別於其他服飾改革者的主張。以下將概述美國服飾改革運動的發展，並比較其他服飾改革者與紀爾曼的主張，以凸顯紀爾曼女性服飾論述的特色。

陸、紀爾曼與其他服飾改革者的主張比較

所謂的服飾改革思潮，泛指改革女性服飾的種種呼聲。有論者認為美國的服飾改革應以「運動」(movement) 名之 (Kelly, 1991: 67-76)，也有學者認為若冠上運動之名，容易誤導人們以為服飾改革是個凝聚力強、有組織且訴求一致的系列改革運動 (Fischer, 2001: 4, 30-31)。自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前期，美國社會要求改善或改變女性穿著樣式的服飾改革聲浪此起彼落，舉凡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平等穿衣理念、水療運動的養生保健觀、服飾改革者的功能性

與美感等訴求，以及女權運動解放女性身心的呼籲都包含在內 (Kriebel, 1998)。這些社群或團體從不同動機出發，但皆強調時尚服飾為女性帶來的束縛、折磨與痛苦，他們的改革訴求不盡相同，唯一的鬆散共識是女性服飾有改革的必要。

美國服飾改革思想，可追溯至一八二〇年代中期。當時有「英國社會主義之父」之稱的羅伯特·歐文 (Robert Owen) 在印第安那州南部經營的烏托邦社群「新和諧社區」(New Harmony Community)，曾出現改良女性服飾的先聲。歐文秉持著平等與理性信念，批評豪華服飾帶來階級與貧富差距，主張服飾不應有嚴格的性別分野。這種反對奢侈開銷、主張平等合作與共同生產消費的精神，促使該社區中的女性開始穿上褲子 (pantaloon) 工作 (Fischer, 2001: 33-45)。褲裝的穿著，雖未立即改善兩性原有的分工模式，與刻板的性別特質，但至少使女性服飾與性別平等理念產生某種思想聯結，開啓日後服飾改革潮流的契機，為女權運動與服飾改革的未來合作鋪路 (Fischer, 2001: 33-45)。類似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改革團體，還有約翰·諾伊斯 (John Humphrey Noyes) 在一八三〇與一八四〇年代的紐約州西部成立的「鄂內達社區」(Oneida community)。在諾伊斯的理念指導下，該社區婦女打扮得像小女孩一般，短髮、短洋裝配上長褲 (Fischer, 1997: 111-140)。這些早期的服飾改革嘗試，由於社群的獨特性與孤立性，並未獲得太多輿論重視，也無法普及。直到一八五〇年代初，女權運動者領軍掀起的「燈籠褲裝」(Bloomer costume) (Leach, 1980: 244) 風潮，才使服飾改革真正成為時人討論的焦點。²⁸

²⁸ 這種燈籠褲裝早先是在一八四〇年代，水療運動者私下從事體操活動時的服裝。燈籠褲裝被媒體冠上女權運動健將愛米莉亞·布倫姆 (Amelia Jenks Bloomer, 1818-1894) 的姓，因為她是首位在期刊公開此種仿效土耳其褲 (Turkish pantaloons)

燈籠褲裝的發起人愛米莉亞·布倫姆 (Amelia Jenks Bloomer) 形容它「舒適、輕盈、簡單又自在，很適合我忙碌生活的活動需求」(Bloomer, 1976: 69; 另參見Newton, 1974: 1-12)。²⁹ 這群女權運動者，原先無意透過改革女性服飾來發抒其女權訴求，也未抱持特定的改革想法來穿褲裝 (Bloomer, 1976: 65-67)。但隨著媒體賦予燈籠褲裝高度的曝光率，她們開始因勢利導地討論女性問題。女權運動大將伊莉莎白·史丹頓 (Elizabeth Cady Stanton) 曾指出，女人的長裙象徵其低落的社會地位，女人都成了時尚的奴隸：

女性長期受巴黎的時尚惡魔之苦。緊腰與拖曳的裙子剝奪了她呼吸與行動的自由。難怪男人規定她的活動領域。因為她每一個轉身，都需要男人的協助。(Clinton, 1984: 148-149)

在服飾改革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之水療運動 (water-cure movement) 支持者，則大力附和由女權陣營掀起的燈籠褲熱《水療雜誌》(*Water-Cure Journal*)，並在一八五一年開始報導相關課題 (Cayleff, 1987: 126-127)。³⁰ 不過，水療運動者與女權運動者對女性服飾課題的立場，仍有差別：前者著重於從道德與健康改革的層次，批評女性時尚服飾 (Cayleff, 1987: 125-139)，後者則正視女性

loons) 樣式的燈籠褲裝者。不過，第一個穿上以短裙搭配長至腳踝的燈籠褲裝扮的人是伊莉莎白·蜜勒 (Elizabeth Smith Miller, 1822-1911)。有一次她穿著燈籠褲裝探訪友人愛米莉亞·布倫姆與表姊伊莉莎白·史丹頓之後，這種新服裝樣式為她們所接受，開始以燈籠褲裝在公開場合亮相，引發眾人的高度矚目、討論與爭議。女權運動陣營中陸續穿起這種改革服飾的，包括伊莉莎白·史丹頓、露西·史東 (Lucy Stone, 1818-1893) 與蘇珊·安東尼 (Susan Anthony, 1820-1906) 等。

²⁹ 這種改良式穿著後來也出現並流行於英國社會。

³⁰ 水療運動者進行服飾改革的策略有三：(一) 呼籲以優生保健的理由來推行服飾改革；(二) 由女人現身說法證明改革服飾的自由自在；(三) 指稱改革服飾將提升女性的自我形象與文化地位。

服飾與女權的密切關聯。當時女權陣營中，有人企圖把握燈籠褲熱潮的時機，將改革服飾政治化，賦予其明確的女性覺醒意涵，並向全國推廣 (Fischer, 2001: 91-94)。未料此一策略受到輿論強烈的干擾與阻撓，媒體多將報導重心放在她們公開演說時穿著的褲裝，反倒忽略演說的內容 (Mattingly, 2002: 37-61)。而且，這些女性以褲裝來推動服飾改革與女性權益，引發不少男性與主流社會的恐懼與抗拒，未能獲得其他服飾改革者的廣泛認同。因為對當時多數人而言，褲子是男性的象徵、特權與優勢，一如裙子被視為女性的代表、身分與地位。人們擔憂女人如果穿上褲子，女人味可能不再；失去穿褲子特權的男人，則無法確保其男子氣概 (Clinton, 1984: 149; Fischer, 2001: 79-99, 171-173)。以往嘲笑時尚女裝的輿論，竟轉而攻擊燈籠褲所標榜的「自由女裝」(freedom dress) (Fischer, 2001: 100-101; Kelly, 1991: 67-76)。時尚雜誌如《高蒂淑女》(*Godey's Lady's Book*)，也抱怨這些燈籠褲裝者，將室內體操運動褲穿到戶外甚至社交場合，實太過逾越與缺乏美感 (Miller, 1999: 52)。³¹ 即使到十九世紀後期，仍有服飾改革者不認為女人應該穿得跟男人一樣 (Woolson, 1874: 147-149; 1875: 227-228)。這場燈籠褲裝運動瞬時演變為性別政治鬥爭，出現對發起者弊多於利的情勢。雖然這群女權運動者明瞭服飾對女性生活的廣泛影響 (Riegel, 1963: 390-401)，但面對魚與熊掌無法兼得的兩難局面，仍決定捨褲裝以就投票、受教育與職業等女權訴求，再度穿回長裙與束腰 (Kesselman, 1991: 495-510; 另參見Bloomer, 1976: 70)。³² 女權運動者

³¹ 對這些迎合或代表主流兩性觀與服飾觀的雜誌而言，穿著長裙與束腰的女性，仍然能夠騎自行車、打板球、高爾夫 (尤其自一八九〇年代以降)；女性不必然要穿上褲子，才能運動。

³² 在該文中作者沒引包括伊莉莎白·史坦頓與蘇姆·安東尼等女權運動大將所發表的關於女性服飾的文章，其中可見她們都清楚女性時尚服飾對女人地位、健康、

透過褲裝來表現女人痛苦的策略，雖然喧騰一時，惜未獲預期成果。

這場燈籠褲熱潮過後，服飾改革的呼聲未完全斷歇，但大致轉向提倡內衣物件的改良 (Cunningham, 2003: 205；另參見Kriebel, 1998: 5)。較著者有一八五六年由傑克森博士 (Dr. James C. Jackson) 成立的「全國服飾改革聯盟」(National Dress Reform Association)，其訴諸健康、美感與實用目標，運作到一八六五年。另有發展於一八六〇年代中期到一八七〇年代中期的基督復臨派安息日會 (the Seventh-day Adventists)，主持者愛倫·懷特 (Ellen G. White, 1827-1915) 與其夫基於宗教熱情與健康原則，提倡女性服飾改革 (Fischer, 2001: 125-131)。還有一些醫生 (包括少數女醫生)，也加入服飾改革陣營，他們的批判火力集中於時尚服飾對女性造成的折磨，諸如對身體 (尤其中間軀幹) 的嚴重擠壓、在腰間懸掛重物，³³ 以及繁複服飾造成的裡外溫度差距對健康的危害等 (Woolson, 1874: 124-125)。這些醫界人士雖偶爾從藝術美感的角度抨擊時尚服飾，斥責時尚的威力造成女性的「服飾瘋」(the feminine mania for clothes) (Woolson, 1875: 103-113)，但其主要關懷，仍是女體的健康與孕育後代的職責。他們特別強調時尚服飾直接導致女性身體虛弱與痛苦，其惡果不只戕害女性，更削弱整個國家的力量 (Woolson, 1874: 124-125；另參見Ecob, 1892)。

從一八八〇年代到一九二〇年代，美國社會處於社會、政治、經濟、都市改革聲浪風起雲湧的進步時代 (Progressive Era) (Ebner, 1977)，對女性服飾有意見者，不再明顯標舉服飾改革的旗幟，轉而融入其他陣營的相關改革訴求中，更多元地實踐服飾的改良。某

生活發展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Kesselman, 1991: 495-510)。

³³ 此指長裙、襯裙、裙撐、裙墊這一類需要將重力放置於腰間以垂掛而下的服飾與物件。

些女性服飾的樣式與風格，則因女性開始參與體育與戶外活動，而出現相應的調整 (Marks, 1990: 115-145)。有的職業女性轉而參考男性服飾的功能性樣式及設計理念，修正自身的服飾樣式 (Crane, 2000: 111)。女性俱樂部及藝術工藝活動 (arts and crafts movement) 這類涉及批判時尚的組織，也為追求活動自由與身心發展等目標，逐步落實某些服飾改革理念 (Blair, 1980; Fischer, 2001: 171-173; Kriebel, 1998: 84-100)。社會學家如齊美爾 (Georg Simmel) (1904: 130-155) 與韋伯倫等，更不約而同地選擇時尚與女性服飾，做為批判社會文化與資本主義的論述主題。這些改革呼聲匯聚成一股反時尚的潮流，終於促成女性服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顯著的改變。

紀爾曼置身於一波波的改革浪潮中，也屬重要的弄潮者之一，其女性服飾論述與前述服飾改革者的理念或主張異同何在？她曾在〈女〉文中評述道：

在所謂「服飾改革者」不連貫的努力下，其主要內容擺在改革婦女的衣著，而首要的課題是某些服飾物件的優生或保健效果；再來是美學品質 (esthetic quality)，以及在較小的程度上自我表達的原則。(1915c: 75)

綜觀〈女〉文可知，紀爾曼與前述服飾改革者的差異在於，她不只從優生、保健、美學與自我表達的角度出發，討論女性與服飾之間的關係與問題，更賦予服飾改革超越前人主張的性別與社會批判意涵。因此，接續上面那段引文，她繼續指出：「若不清楚明瞭基本法則——也就是我們的衣著與精神及身體的密切關係，其極端的社會重要性，以及正確的衣著在生活各層面關係之確實必要性——的話，是無法順遂並徹底進行改革的」(1915c: 75)。言下之意，服飾不只涉及女性的生活，更深刻影響其身心發展。當十九世紀中

葉的女權運動者嘗試穿上，後又放棄燈籠褲裝時，她們選擇的是暫緩對女性身體束縛的抗爭，將心力集中於爭取女性的教育、政治與經濟等權利上 (Bloomer, 1976: 65-81)。從當時輿論反對女子褲裝的巨大聲浪，不難想像「女人穿上褲子」的舉動，對當時男女有別的社會性別機制造成強烈的威脅。³⁴ 雖然有些女權運動者明瞭時尚服飾對女性的深刻箝制，但時代氛圍的局限及當中多數人對性課題的迴避傾向 (Weissman & Hymowitz, 1993: 109-110；另參見 Clinton, 1984: 147-165; DuBois, 1981: 2-26, 88-112)，³⁵ 使她們並未像二十世紀初的紀爾曼一般，強調女性時尚服飾所展現的「性誇大」(the magnification of sex) (Gilman, 1915c: 78) 本質對女性生活的全面影響 (Gilman, 1915d: 103)。

紀爾曼聲明，時尚服飾最大的罪過，在於阻礙穿衣者的社會發展，那是「比傷害女性身體或堅持性別差異來得更嚴重的傷害」(1915c: 78)。時尚服飾讓女性停留在性玩物的意象，使女性難以真正覺醒並意識到獨立思考、實踐自我與貢獻社會的重要性。因此，她不認同女權運動者捨服飾改革而就投票權的運動策略：

現在許多女性熱切要求投票權，最熱烈者說，「行使投票權是人性。我是人，請把我當人看待，給我投票權。」但是，男人在商店櫥窗所看到展露無遺的內衣，以及在宴會和舞會中所看到的裸脖、裸肩、裸胸的淑女，卻是一群服飾在吶喊著：「我是女人，請把我當女人看待。」

³⁴ 愛米莉亞·布倫姆亦曾提及伊莉莎白·史丹頓穿著這身褲裝大約二至三年，後因不堪其父與友人的強烈反對壓力，而放棄褲裝再度穿上長裙。至於布倫姆穿著褲裝達六至八年的時間。

³⁵ 早期的女權運動者，大多避談攸關性的課題，例如懷孕、墮胎或避孕等。即便伊莉莎白·史丹頓的言論曾觸及這部分，但十九世紀後期逐漸以婦女投票權為主流的美國女權運動，卻仍較不重視這部分的問題。

於是，他這麼做了。

對這些男性而言，他實在無法相信如此打扮的女性會是明事理的人，她們似乎只是期期於展現「女」性的人類。……

我們能責怪那樣的男性想法嗎？

我們能符合邏輯地要求一種形式的自由，同時又明顯地願意臣服於無意義的時尚統治嗎？(1915l: 333)

紀爾曼對婦女投票權者 (suffragist) 的批評，不是因為她反對女性獲得投票權，而是她更深切地體認到，切身的服飾實廣泛宰制女性的身、心、靈與社會發展，若不改革服飾，縱有投票權也是徒然。她相信女人透過服飾，能表達重要而多元的意念；對自身服飾做出理性而健全的選擇，既能維護個人私益，又可促進群體公利，並使兩性互動更臻和諧：

如果女人從這些沒有必要的奴隸狀態解放，開始自己決定該穿什麼衣服時，對其心理影響將非常巨大，不只影響她們自己，還影響她們的兒子、兄弟與丈夫。

摧毀這個過大的人造市場對經濟有好處；女性變得更健康和美麗是另一件好事；但是最大的好處是我們得到抬頭挺胸、眼光炯炯有神、有判斷力和強壯意志的女性。她們是自由、強壯、健康有活力、敏捷又優雅的女性；她們知道自己要什麼以及要這些東西的理由，並且堅定地去達成。有了這樣的女性，我們就會有同樣強化的男性。(1915k: 307)

紀爾曼的女性服飾論述最大的特色，在於其不只從女性個體出發來審視服飾問題，而是綜合經濟社會學、社會批判、女性主義、人道主義等思想，從社會整體發展的宏觀角度批判時尚服飾。因此，她抨擊奢華的女性服飾，導致過多不必要的人力與物力投入紡織成衣與製造工業，造成社會成本的重大浪費 (1915i: 245-246)。她也基於保護動物的立場，指責時尚服飾動輒捕殺飛禽走獸，以獵

其羽毛或毛皮，是殘忍與破壞自然之舉，而主張兩性都應穿著不損失動物生命與自然資源的服飾，並「以最少的支出，穿出最有價值的衣著」(1915h: 220)。

那麼，紀爾曼是否曾主張女性究竟該怎麼穿、穿什麼服裝樣式呢？〈女〉文雖鉅細靡遺地論述了服飾與女性及其人生的種種關係，紀爾曼卻未像某些服飾改革者或醫界人士一般，針對女性衣著與物件樣式提出具體的改革內容，或提倡某種改良服式 (Fischer, 2001: 116-117)。³⁶ 或許這正是她為何不會被視為服飾改革者的重要原因，而她也從不以服飾改革者自居。她強調自己所宣揚的，

並不是服飾改革運動。我們不推廣任何一種服飾，也不費盡力氣支持彼此做一些小的進展，像是「掃街長裙」盛行時，「雨中雛菊」所推動兩天穿短裙運動……我們要的是每個人去運用判斷力和意志力，使其愈用愈堅強。(1915l: 333-334)

簡言之，她主張每位女性有權利與責任，決定自己在任何場合的服裝樣式。因為「事實上，不可能有一套適合所有人在任何時刻穿的服飾」：

甚至對某個個人而言，除非她一輩子都只做同一件事，否則她也不可能找到任何永遠適合她的完美服裝式樣。不，這個世上並非期待有一套完美衣裳的出現，而是在個人受教育後的品味發展，以及伴隨而來的強有效率的意志力。衣服必須因人而異，否則就失去衣飾表達個體性的最大功能。(1915l: 329)

紀爾曼在《婦女與經濟》中曾說過「人類最高尚的特質與性關

³⁶ 舉例來說，「全國服飾改革聯盟」的成立者傑克森博士號稱創立了所謂的「美國裝」(American costume)，其樣式大致是讓裙子更短，而褲子的剪裁則趨向男性化。

係完全相容」(Gilman, 1966: 108)，這段話可適用於她十七年後在〈女〉文中闡揚的女性服飾真諦：女人的衣著不僅沒必要與男人一樣，也毋須放棄多樣性、美感、優雅或裝飾；當這些特質「真正符合這些字眼的意思與個人感覺」，而非依恃刻意凸顯性感的服裝樣式時，真正的兩性吸引才會自然而真摯地滋生 (1915i: 250)。以往的服飾改革論述，泰半忽略紀爾曼最強調的「女性服飾局限其社會發展」一環；究其原因，或許是主導者多為男性之故。早期進行女性服飾改革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社群，皆由男性領袖主導其樣式與內容，並將改革服裝一事賦予宗教、美學或實用主義等意涵。後來的「全國服飾改革聯盟」(Fischer, 2001: 116-117)³⁷ 與基督復臨派安息日會 (Fischer, 2001: 125-131)，³⁸ 若非由男性主持，便是仍保留男性中心的意識。³⁹ 眾多男醫生秉持醫學的專業知識，批判束腰與長裙等繁重累贅的物件，支持改良的內衣款式，更加確立男性的專業與指導女性的權威 (Steele, 2001: 67-85)。當達爾文主義於十九世紀後期流行於美國社會，專家學者紛紛從科學、醫學、生理學等立場出發非難時尚服飾時，引領相關論述者仍是男性，其不變的基本

³⁷ 該組織仍然希望維持男女有別的既有兩性觀及服飾穿著。他們不過是希望引導女性服飾朝向更符合健康、美感與實用性的目標改進。他們也不稱自己的改革服飾為女權運動者提倡的燈籠褲。

³⁸ 基督復臨派安息日會的主持者愛倫·懷特，在一八六七年之後鼓勵女性信眾穿著改革服裝，主要因為她們相信上帝與時尚不並存，時尚也與女人在心智、精神與身體的獨立不相容。人體是侍奉上帝的殿堂，因此必須夠健康與強壯，始能做神工。雖然如此，愛倫·懷特並不能算是個支持女權的女性主義者。因為她強調男人是一家之主，這是神意。

³⁹ 這種維護主流兩性觀，甚至仍多以男性為主導力量的服飾改革發展傾向，也間接說明為何十九世紀中葉由女權運動者掀起的燈籠褲裝運動，會受到強烈的社會反彈，然在那之前或之後，由男性主導批評女性時尚服飾，或提出改革理念的聲音，都不曾引發像那次由女人公開主張穿褲裝一般猛烈的抗拒與反撲。這暗示了男人冀望掌握批評女性 (的時尚穿著) 與指導女性 (如何改革穿著) 的權力。

立場，是男女有別 (Newman, 1985: 16)。他們援用達爾文主義討論兩性問題，主張改革女性服飾的動機，在於維護女／母體健康以保障下一代的強健。換言之，這類由男性以專家身分提出的服飾改革論述，不僅難以撼動束縛女性社會發展的主流兩性觀，反而可能強化男優女劣的社會刻板印象 (Lauer & Lauer, 1980: 581-589)。⁴⁰

紀爾曼與這些多半仍認同主流兩性觀的服飾改革者不同，她毫不保留地揭示男性應為女性服飾的弊端擔負重責。當時許多男性，逕將時尚服飾視為女人虛榮天性的表現，批評時尚服飾虛華無益，紀爾曼則反駁道：

假如一個女人真的接受男人的批評，在大庭廣眾之前穿上舒適、保健卻不合時尚的衣裝，你說結果會如何？你認為男人仍會被吸引、會認為「哇！這真是一個不愚蠢、不虛榮的女性」而競相追逐她嗎？他們不會。(1915e: 137)

紀爾曼一方面指責一般男性競相追求的，仍是裝扮華麗時髦的女性，對穿著改良服裝的女性，頂多只予以口惠而實不至的讚美，導致女性愛慕虛榮與奢侈浪費，扼殺她們穿著衛生與保健的服飾之欲望 (1915e: 137)。但另一方面，她並未豁免女性自身應負之責，也不曾在時尚服飾問題上，將男女兩性簡單地二分為加害者與受害者。因為即使女性不是設計或製衣者，卻仍是購買者與消費者，「不能用歸咎前人，或歸諸於先前的壓力等藉口，來推卸自己現在的責任」(1915h: 218)。

綜上可知，紀爾曼並未在〈女〉文或其他女性服飾文章中，提倡某一特定類型的改良服飾，她本身也不曾因穿著某種改革服飾，

⁴⁰ 有學者便表示，十九世紀末葉美國服飾改革的發展，相當程度地受到男性勢力的影響；以至於女人是「不改(服飾)也錯，改也錯」，除非是依照男人、專家的指示與建議而行。

而為人矚目或批評。她對改良服飾較具體的描述，大約只出現於《她鄉》的小說情節中(夏綠蒂·柏金斯·吉爾曼，1998)。⁴¹ 紀爾曼純粹是在論述的層次上批判女性時尚服飾，還未達到付諸行動的程度，也不曾身體力行地穿著確切的女裝改革樣式；此舉既可讓她維持批判時尚服飾的力道，也可迴避因提出某種固定改革樣式而被批評的可能。從實踐的角度而論，紀爾曼的女性服飾論述主張不夠具體，所謂的多樣性與優雅美感等標準，容易使人無所適從，淪於自由心證。然而值得肯定的是，其論述的層次與內涵豐富，統攝過去服飾改革者曾揭櫫的主張，且直言抨擊男性運用經濟優勢扭曲兩性的性關係，以致剝奪女性的選擇自由，也壓抑她們的身心發展。這種兼具女性主義、人道主義、優生概念、環保思想與社會經濟學的綜合批判，堪稱紀爾曼女性服飾論述的主要特色。

柒、結語

迄今為止，學界並未真正觸及並討論過紀爾曼在美國服飾改革

⁴¹ 例如：「她們一頭蓬鬆閃亮的短髮，沒有戴帽子，一套輕便結實的裝扮，短袖和及膝的馬褲，打著綁腿」(38)。至於給男人穿的衣服，則「簡單到了極點，穿起來絕對舒服。當然我們都覺得像劇院裡跑龍套的。穿在底層，過膝蓋肩連身的長衫，輕薄柔軟，好像一些人的連身睡衣。某種半長的襪筒穿到膝蓋下面，頂端有鬆緊帶綁著襪筒邊緣。上面是比較厚的連衫褲。……衣服和我們所見的女人穿的相似。」(56-57)「這些衣服是絕佳的運動服裝，可以隨意活動，我不得不承認比我們平常穿的美麗多了」(66)。「這些女人有各種各樣、為數驚人的口袋。各種服裝上都是，尤其是中間層的衣服特別貼滿口袋。」(75)「她們說她們只有在太陽下工作時，需要遮蔭才戴帽子。她們的帽子就像中國人及日本人用的輕便的大草帽。天冷時，她們包頭巾或兜帽」(95)。「我們以為她們會屈服於我們所謂的『女性的虛榮』『流蘇和花邊』。結果發現她們發展出比中式袍子更完美的服裝，美麗貼心，永遠實用，永不失尊嚴和品味」(142)。「她們的衣服和裝飾品沒有一點『來找我吧』的元素」(220)。

運動中扮演的角色與貢獻。〈女性的服飾〉在二〇〇二年以專書的形式，被美國社會學者重新校對出版，或許是學界開始留意其服飾言論之契機。雖然從《先驅者》的銷售情形觀之，當時真正閱讀到〈女〉文的讀者人數相當有限，但該文所彰顯的批判力道、論述深度與思想價值，無法也不應以那微小的數目來衡量 (Gilman, 1916: 286-290)。⁴² 〈女〉文並非紀爾曼一時興起的隨意之作，文中所闡述的重要觀點，在《婦女與經濟》、《她鄉》及《我鄉中有她》及其他時評等不同文類的作品中皆曾出現 (Hill & Deegan, 2002: 9-23)。本文透過對這篇長文的解讀與分析，發現紀爾曼賦予女性服飾課題相當充沛的論述能量。她針對女性服飾所提的改革主張，不僅涵蓋便利、保健、衛生、優生、自主等訴求，更反映出自身社會主義與女性主義的思想根柢所孕育的批判精神，包括對資本主義、父權體制與主流兩性觀的批判。紀爾曼充分掌握女性服飾課題，來發揮其「性—經濟」雙重批判論述的核心意涵。她在〈女〉文中，企圖論證流行女裝的多樣性、繁複性與好變性所反映的，雖然包含兩性各自的機巧考量與欲望競爭，但女性利用時尚服飾以獲取經濟優勢，所須付出的代價，比那些透過女裝展現自身財富與能力的男性，實巨大得多。歸結而言，女性時尚服飾暴露出不健全的兩性關係與社會體制，其使女人「很難展現自己的意願，在穿著上亦然」(1915j: 275)。

綜觀本文，不難發現紀爾曼立於高過其他女性的思想層次，來論證父權體制對她們造成的種種壓制與扭曲。當她不遺餘力地批判「性—經濟」雙重男性權力運作之際，也連帶將女性視為被壓抑與宰制的客體，抹殺她們可能透過各種生活中的言行及穿著，或明

⁴² 在《先驅者》將近出版末期時，紀爾曼曾有篇〈刊物宗旨概述〉(“A Summary of Purpose”)，其中說明該刊每年大約有五千到七千名讀者。

確、或微妙地抗拒與回應的可能性。換言之，紀爾曼的女性服飾論述及其「性—經濟」雙重批判，呈現出的是女性被動、無能與羸弱的意象，此與為數漸增的知識女性自十九世紀中後期逐漸活躍地參與藝文、慈善及社會改革運動的積極表現，有相當程度的落差 (Blair, 1980)。⁴³ 此種落差，一來反映出許多知識女性——例如上文所言的「吉卜生女郎」——在服飾上仍舊附和主流時尚，二來則凸顯紀爾曼對女性身心覺醒的強烈求全要求。對她而言，只要與強調女人生理的性魅力有關的舉措，都應予以批判與摒棄，因為那都是不把女人當人，而只把女人當女人的物化思想在作祟。基本上，紀爾曼把「性」視為只是人類繁殖的必要行為，不認同兩性為追求享樂而沉溺其中 (林淑琴，2003：114-131)。她對透過時尚服飾來宰控女性的父權機制，以及不論自覺不自覺卻仍接受時尚現狀的女性，都表達出強烈的不滿。這也是為何她對一九二〇年代風靡全美國的新女性形象「飛波兒」(flapper) 及其表現，頗有微辭之因 (王受之，2001：400-419；另參見Beck, 1992；Gordon, 1987：211-230；Kriebel, 1998：101-123；Lowe, 2003：121-123；Melman, 1988：15-37；Rubinstein, 2001：121)。⁴⁴

⁴³ 關於當時美國知識女性日漸豐富的社會或藝文活動，可以俱樂部女性 (clubwoman) 為代表之一。Blair 將這群俱樂部女性的文學組織定義為家庭女性主義 (domestic feminism) 的一種形式。家庭女性主義者在實踐中對既有形象的保存，為其展開新的路向奠下基礎。儘管公眾有所批評，仍有數以千計的十九世紀女性有效地利用「淑女」特質，來為其離家並在原屬男人領域的社會施展特殊影響力的行為做辯護。她們運用被視為女人的天賦，秉持所謂的家庭美好道德或意識形態，終結了坐困家中的牢籠困境，並且在公共領域逐步發揮影響力。

⁴⁴ 「flapper」這個辭彙早在一九二〇年代之前，便已有歷史悠久的各式意義。十九世紀之後，主要被形容為剛長羽毛要學飛的鳥。到一八七〇年代，flapper 開始被賦予「剛出社會的天真女性青少年」與「雛妓」(child prostitute) 兩種相反的意義。從這個辭彙意義的發展，可觀察維多利亞時代人們對青少年與性之間的曖昧觀點與聯繫。一次世界大戰之後，flapper 出現更多元而複雜的意涵；可廣泛地指涉孩

飛波兒的主要外表特徵，是一頭俏麗短髮 (bobbed hair)，衣著風格帥氣、瀟灑、簡潔，主要裝扮包括低腰或露背洋裝、短裙、鐘型帽 (cloche hats)、長串珠項鍊、高跟鞋、浣熊皮大衣 (raccoon coats)，與肉色透明絲襪 (葉立誠，2000：192-193；另參見Lowe, 2003：121；Wilson, 1985：40-41)。⁴⁵ 若就早先服飾改革者的保健與衛生等主張審視之，飛波兒的服裝確更實用與合乎自然。其拋棄緊塑體型的束腰與緊身胸衣，避免對女體可能造成的傷害，整體樣式也更簡單、清爽。飛波兒以新髮型與新造型，標誌出她們在服飾上獲得的自由與解放 (Fass, 1977：223-224)。她們的行事作風，也不受限於上一代的賢妻良母與端莊淑女等角色限制。但若以紀爾曼的論述標準來衡量飛波兒，她們不只尚未掙脫時尚主導的意識形態框架，獲得真正能發展主體性與個人風格的獨立與自主，且其言行服飾仍與性慾及性魅力之間，有千絲萬縷的糾纏 (Fass, 1977：260-290)。⁴⁶

子氣 (childishness)、性早熟 (precocious sexuality)、善變 (fickleness)、傻氣 (inanity)、反覆無常 (inconsistency) 等。較正面的意義，則包括年輕 (youthfulness)、感情強烈 (intensity)、活力 (energy)。這群新生代女性與其母親輩的「吉卜生女郎」相當不同，堪謂挑戰並告別十九世紀服飾與性別觀傳統的重要青年代表。大戰過後，人們感嘆世事難料，應及時行樂；汽車工業的發展、電影文化的興起，促使人們更重視休閒娛樂生活。加上一九二〇年婦女參政權的目標終於達成，一時間缺乏能再凝聚人心的女權訴求，使婦女運動出現停滯狀態。一群就讀於大學的年輕女性，開始更為自在並展現自我風格的享樂生活，競逐發展女性美與女人味，但忽略同性前輩所在乎的集體女性主義思想。在大眾消費主義 (mass consumerism) 迅速發展與電影等媒體的廣泛傳播下，「飛波兒」的形象簡直不分階級與種族地風靡全美國社會，成為時下女青年趨之若鶩的時尚風格。

⁴⁵ 當時走紅於巴黎時尚界並帶動飛波兒造型的設計師，當屬香奈兒 (Gabrielle Chanel, 1883-1971)。這位時尚界傳奇人物，從自身言行風格到設計服裝造型，都帶動女性追求活力、年輕、自主的女裝款式與行為舉止。可以說，香奈兒為女裝界注入的新血與精神，為女性服飾帶來相當程度的抒解與自由。

⁴⁶ 此指「飛波兒」相當著意於運用其身體、化妝、服飾與行事作風，在公領域當中營造出以往女性望塵莫及的性魅力 (sex appeal) 與性意涵。同時，一九二〇年代

當紀爾曼於一九三五年回顧前數十年的發展時，曾寫下這段話：

這個新世界，至今已過了第一個二十五年，成就許多先人努力奮鬥的目標。但就像爬山，每克服一座山峰之後，會發現另有更多更高的山峰等著我們征服。例如我們已為婦女爭取到投票權，對我來說，投票權從不是個成功的極致，我期待比投票權更多更好的事發生在婦女身上。

好比說，她們（註：指當時的年輕女性）仍然像過去一樣是時尚的奴隸，縮短裙長、裸露背部、展現腿部、鼻子撲粉，表現得就像以前的女人一樣愚蠢，假如不是更蠢的話。(1991: 318)

紀爾曼對理想女性服飾的期許，是允許女性自由發揮想像力、創造力，並配合各種活動需求與場合，來設計或選擇能展現自我個性、風格與美感的衣著樣式。她曾基於健康、舒適與自由等原因，在一九一六年某次巡迴演講中，提倡女子留短髮。飛波兒雖然短髮，卻遠未達到紀爾曼所期許的「不靠性（魅力）來展現自我價值」的理想。在紀爾曼眼中，這群俏髮青春女郎，仍甘於被時尚、男人、性慾及消費文化所支配而不自知；她們的服飾及其所象徵的新道德與價值觀，在體現某種身心解放的同時，也暴露女性自省與自覺意識的局限性 (Stevenson: 1999: 219-242)。

對紀爾曼來說，一個女人的穿著，涉及她的健康、理智、知識、藝術品味、個人判斷與社會發展 (1915j: 275)。將穿著的選擇權交回女性手上，意謂著她們不只對自身的品味與樣式負責，也向世人展現真正的自我、思想與性別意識 (1915e: 137-138)。⁴⁷ 女性惟有

的年輕男女婚前親吻擁抱等愛撫行為 (petting)，以及婚前性行為的情況都比以往增加許多。

⁴⁷ 在〈女〉文中，紀爾曼描繪出她的願景：「當女人能從經濟上屈從於男人的恥辱地位中獲得自由時，她們就能發展自己，穿出自己的衣服，並展現真正的美。……

真正掌握服飾的穿著自由，並不受性別刻板印象的局限，才得以擁有突破舊有桎梏的動力與能力。紀爾曼相當強調思想自主與經濟獨立，主張這些應由個人身心的解放做起，而非投票權那些外在權利便可實現。出於這些堅持，使她的服飾改革論述，兼具批判的力道與深度，同時卻也無可避免地有陳義過高之虞，帶有強烈個人的理想主義色彩。綜言之，在紀爾曼的批判論述中，改革服飾既能改變女性、改善兩性關係，更能健全社會與維護自然。此一言論雖可能過於理想，卻也在某種程度上，將服飾改革帶往更深廣的論述層次，而發人深省。

人的身體不應只是像個沒有生命的模型一樣，任憑各式各樣的衣服來穿他／她……當男人女人都成熟而平等時，人的美感與穿衣需求會相合，創造出真正美好的服飾來，也可以允許個人特色或創造力。自由的身體，誠實地表達的精神，完善地滿足人的需求，以及各種不強迫，但歡迎的新奇展現與創造，可以充盈我們的世界，賦予服飾我們不曾夢想過的美好。」

參考文獻

- 王受之 (2001)。〈「女男孩」的年代——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九〉，
《藝術家》，314: 400-419。(Wang, S. Z. [2001]. The age of
masculine girls: 1920-1929. *Artist Magazine*, 314: 400-419.)
- 江勇振 (2004)。〈男人是「人」、女人只是「他者」：《婦女雜誌》
的性別論述〉，《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2: 39-67。(Chiang,
Y. C. [2004]. The masculine universal and the feminine other:
Gender discourse in *the Ladies' Journal*. *Research on Wome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2: 39-67.)
- 安妮·霍蘭德 (2000)。《性別與服飾——現代服裝的演變》(魏如明
等譯)。北京：東方。(Hollander, A. [2000]. *Sex and Suits* [R. M.
Wei, Trans.]. Beijing, China: Eastern.)
- 林淑琴 (2003)。〈打造她鄉——美國婦女運動先驅吉爾曼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及其烏托邦小說《她鄉》〉，《當代》，188:
114-131。(Lin, S. Q. [2003]. Building up herland: American
feminist Chalotte Perkin Gilman and her utopian novel, *Herland*.
Dandai, 188: 114-131.)
- 夏綠蒂·柏金斯·吉爾曼 (1998)。《她鄉》(林淑琴譯)。台北：女
書文化。(Gilman, C. P. [1998]. *Herland* [S. Q. Lin, Trans.].
Taipei: Nushu.)
- 張小虹 (1994)。〈文本裡有女人嗎？——閱讀《黃色壁紙》〉，
《中外文學》，22, 10: 57-67。(Chang, X. H. [1994]. Is there
women in the text?—Reading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s *The
yellow wallpaper*. *Chung Wai Literary Quarterly*, 22, 10:
57-67.)
- 葉立誠 (2000)。《中西服裝史》。台北：商鼎文化。(Yeh, L. C. [2000].
History of costume: The east and the west. Taipei: Shangting.)
-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編委會 (編) (1986)。《圖解服飾辭典》。新
莊：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Committee of Textile/Fashion
Design and Culture Studies of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Ed.].
[1986]. *Illustrated fashion dictionary*. Xinzhuang: Author.)
- 謝謠玲 (2001)。〈吉爾曼之《女人國》與女性烏托邦的傳統〉，《東
吳外語學報》，16: 1-13。(Hsieh, Y. L. [2001].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s *Herland* and the tradition of feminist utopian fiction.

Soochow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16: 1-13.)

- 蘇子中 (2003)。〈黃壁紙的魅影與黑煙囪的清掃：「醫學／文學」的「歇斯底里」想像——從「休息治療」和「談話治療」談起〉，《中外文學》，31, 10: 110-148。(Su, T. C. [2003]. The phantom of the yellow wallpaper and the cleaning of the black chimney: The “hysterical” imagination of “medical/literature” with respect to the rest cure and the talking cure. *Chung Wai Literary Quarterly*, 31, 10: 110-148.)
- Beck, A. S. (1992). *Asian American women and flapper identity in the 1920'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lair, K. J. (1980). *The clubwoman as feminist: True womanhood re-defined, 1868-1914*. New York, NY: Holmes & Meier.
- Bloomer, D. C. (1976). *Life and writings of Amelia Bloomer*. St. Chair Shores, MI: Scholarly.
- Boucher, F. (1987). *A history of costume in the west*. London, UK: Thames & Hudson.
- Breward, C. (1995). *The culture of fashion: A new history of fashionable dress*.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Cayleff, S. E. (1987). *Wash and be healed: The water-cure movement and women's health*.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Clinton, C. (1984). *The other civil war: American 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NY: Hill & Wang.
- Cogan, F. B. (1989). *All-American girl: The ideal of real womanhood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Athens, Greece: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 Crane, D. (2000). *Fashion and its social agendas: Class, gender, and identity in clothing*.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rossick, J., & Jaumain, S. (Eds.). (1999). *Cathedrals of consumption: The European department store, 1850-1939*. Brookfield, VT: Ashgate.
- Cunningham, P. A. (2003). *Reforming wome's fashion, 1850-1920: Politics, health, and art*.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Darwin, C. (1922).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 London, UK: John Murray.
- Darwin, C. (1958). *The origin of species*. New York, NY: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 Davis, C. J., & Knight, D. (Eds.). (2004).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and her contemporaries: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contexts*. Tuscaloosa, AL: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 Degler, C. N. (1966). Introduction to the torchbook edition. In *Women and economics: A study of the economic relation between men and women as a factor in social evolution* (pp. 6-35). New York, NY: Harper Torchbooks.
- DuBois, E. C. (Ed.). (1981). *Elizabeth Cady Stanton and Susan B. Anthony: Correspondence, writings, speeches*. New York, NY: Schocken Books.
- Ebner, M. H. (Ed.). (1977). *The age of urban reform: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rogressive Era*. New York, NY: Kennikat.
- Ecob, H. G. (1892). *The well-dressed woman: A study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to dress of the laws of health, art, and morals*. New York, NY: Fowler & Wells.
- Eicher, J. B., & Roach-Higgins, M. E. (1992).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dress: Implications for analysis of gender roles. In R. Barnes & J. B. Eicher (Eds.), *Dress and gender: Making and meaning in cultural contexts* (pp. 8-28). Oxford, NY: Berg.
- Fass, P. L. (1977). *The damned and the beautiful: American youth in the 1920's*.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ischer, G. V. (1997). "Pantalets" and "Turkish trousers": Designing freedom in the mid-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Feminist Studies*, 23, 1: 111-140.
- Fischer, G. V. (2001). *Pantaloon and power: A nineteenth-century dress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Kent, OH: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Gilman, C. P. (1886). Why women do not reform their dress. *The Woman's Journal*, 17, 43: 338.
- Gilman, C. P. (1891). The dress and the body. *Pacific Rural Press*, 42, 1: 6.
- Gilman, C. P. (1904). The clothing of children. *The Woman's Journal*,

35, 48: 338.

Gilman, C. P. (1905). Symbolism in dress. *Independent*, 8, 6: 1294-1297.

Gilman, C. P. (1914). The Forerunner for 1915. *The Forerunner*, 5: 12: 336.

Gilman, C. P. (1915a). The dress of women. *The Forerunner*, 6, 1: 20-24.

Gilman, C. P. (1915b). The dress of women. *The Forerunner*, 6, 2: 46-51.

Gilman, C. P. (1915c). The dress of women. *The Forerunner*, 6, 3: 75-81.

Gilman, C. P. (1915d). The dress of women. *The Forerunner*, 6, 4: 102-108.

Gilman, C. P. (1915e). The dress of women. *The Forerunner*, 6, 5: 132-138.

Gilman, C. P. (1915f). The dress of women. *The Forerunner*, 6, 6: 159-165.

Gilman, C. P. (1915g). The dress of women. *The Forerunner*, 6, 7: 189-194.

Gilman, C. P. (1915h). The dress of women. *The Forerunner*, 6, 8: 215-220.

Gilman, C. P. (1915i). The dress of women. *The Forerunner*, 6, 9: 245-250.

Gilman, C. P. (1915j). The dress of women. *The Forerunner*, 6, 10: 273-278.

Gilman, C. P. (1915k). The dress of women. *The Forerunner*, 6, 11: 302-307.

Gilman, C. P. (1915l). The dress of women. *The Forerunner*, 6, 12: 328-334.

Gilman, C. P. (1916). A summary of purpose. *The Forerunner*, 7, 11: 286-290.

Gilman, C. P. (1923). The new generation of women. *Current History*, 18: 731-737.

Gilman, C. P. (1966). *Women and economics: A study of the economic relation between men and women as a factor in social evolution.*

- New York, NY: Harper Torchbooks.
- Gilman, C. P. (1970). *The man-made world; or, our androcentric culture*. New York, NY: Source Book Press.
- Gilman, C. P. (1991). *The living of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An autobiography*.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Gilman, C. P. (2002). *The dress of wome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symbolism and sociology of clothing*. Westport, CT: Greenwood.
- Golden, C. J., & Zangrando, J. S. (Eds.). (2000). *The mixed legacy of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Newark, D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 Gordon, L. D. (1987). The Gibson girl goes to college: Popular culture and women's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Progressive Era, 1890-1920. *American Quarterly*, 39, 2: 211-230.
- Hill, M. R., & Deegan, M. J. (2002). "Introduction" in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In C. P. Gilman, R. H. Michael, & M. J. Deegan (Eds.), *The dress of Wome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symbolism and sociology of clothing* (pp. 9-27). Westport, CT: Greenwood.
- Hofstadter, R. (1955).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Boston, MA: Beacon.
- Kelly, L. D. (1991). Biped in bloomers: How the popular press killed the dress reform movement. *Studies in Popular Culture*, 8, 2: 67-76.
- Kesselman, A. (1991). The "freedom suit": Feminism and dress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1848-1875. *Gender & Society*, 5, 4: 495-510.
- Kerber, L. K. (1988). Separate spheres, female worlds, woman's place: The rhetoric of women's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5, 1: 9-39.
- Kriebel, K. J. (1998). *From bloomers to flappers: The American dress reform movement, 1840-1920*.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Columbus, OH.
- Lane, A. J. (1990). *To Herland and beyond: The life and work of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New York, NY: Pantheon.

- Lauer, J. C., & Lauer, R. H. (1980). The battle of the sexes: Fashion in 19th century America.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8, 4: 581-589.
- Laver, J. (1969). *A concise history of costume*. London, UK: Thames & Hudson.
- Leach, W. (1980). *True love and perfect union: The feminism reform of sex and society*.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Lowe, M. A. (2003). *Looking good: College women and body image, 1875-1930*.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urie, A. (1981). *The language of clothes*.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 Marilley, S. M. (1996). *Woman suffrage and the origins of liberal femi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1820-192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arks, P. (1990). *Bicycles, bangs, and bloomers: The new woman in the popular press*.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Mattingly, C. (2002). *Appropriate[ing] dress: Women's rhetorical styl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 Melman, B. (1988). *Women and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in the twenties: Flappers and nymphs*. London, UK: Macmillan.
- Miller, B. M. (1999). *Dressed for the occasion: What Americans wore 1620-1970*. Minneapolis, MN: Lerner.
- Nelson, J. L. (2000). Dress reform and the bloomer. *Journal of American & Comparative Cultures*, 23, 1: 21-25.
- Newman, L. M. (Ed.). (1985). *Men's ideas/women's realities: Popular science, 1870-1915*. New York, NY: Pergamon.
- Newton, S. M. (1974). *Health, art & reason: Dress reformers of the 19th century*. London, UK: John Murray.
- Plante, E. M. (1997). *Women at home in Victorian America: A social history*. New York, NY: Facts on File.
- Riegel, R. E. (1963). Women's clothes and women's rights. *American Quarterly*, 15, 3: 390-401.
- Roberts, H. E. (1977). The exquisite slave: The role of clothes in the

- making of the Victorian woman. *Signs*, 2, 3: 554-569.
- Rubinstein, R. P. (2001). *Dress codes: Meanings and messages in American culture* (2nd ed.). Boulder, CO: Westview, second edition.
- Rudd, J., & Gough, V. (Eds.). (1999).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Optimist reformer*. Iowa City, IA: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 Scharnhorst, G. (1985).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A bibliography*. Metuchen, NJ: Scarecrow.
- Simmel, G. (1904). Fashio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10, 1: 130-155. (Reprinted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57], 62, 6: 541-558.)
- Sims, S. (1991). The bicycles, the bloomer and dress reform. In P. A. Cunningham & S. V. Lab (Eds.), *Dress and popular culture* (pp. 125-145). Bowling Green, OH: Popular Press.
- Soper, K. (2001). Dress needs: Reflections on the clothed body, selfhood and consumption. In J. Entwistle & E. Wilson (Eds.), *Body dressing* (pp. 13-32). Oxford, NY: Berg.
- Spencer, H. (1985). Psychology of the sexes. In L. M. Newman (Ed.), *Men's ideas/women's realities: Popular science, 1870-1915* (pp. 17-24). New York, NY: Pergamon.
- Steele, V. (2001). *The corset: A cultural histo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tevenson, K. (1999). Hair today, shorn tomorrow? Hair symbolism, gender, and the agency of self. In J. Rudd & V. Gough (Eds.),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Optimist reformer* (pp. 219-242). Iowa City, IA: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 Summers, L. (2001). *Bound to please: A history of the Victorian corset*. New York, NY: Berg.
- Veblen, T. (1899). The barbarian status of wome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 4: 503-514.
- Veblen, T. (1934).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 New York, NY: The Modern Library.
- Weissman, M., & Hymowitz, C. (1993). 《美國婦女史話：女性沉默與抗爭》(彭婉如譯)。台北：揚陸。(Weissman, M., & Hymowitz, C. [1993]. *A history of women in America* [W. R. Peng, Trans.]

Taipei: Yangsheng.)

Welter, B. (1966). 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 1820-1860. *American Quarterly*, 18, 2: 151-174.

Wilson, E. (1985). *Adorned in dreams: Fashion and moderni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oolson, A. G. (Ed.). (1874). *Dress-reform: A series of lectures delivered in Boston, on dress as it affects the health of women*. Boston, MA: Roberts Brothers.

Woolson, A. G. (1875). *Woman in American society*. Boston, MA: Roberts Brothers.

Zagarri, R. (1992). Morals, manners and the republican mother. *American Quarterly*, 44, 2: 192-215.

Zakim, M. (2003). *Ready-made democracy: A history of men's dress in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60-1860*.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iscourses on Dress Reform and Beyond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s “Dress of Women” and Its Critical Implication

Rachel Hui-chi Hsu

Department of History, Tunghai University
E-mail: rachel928@yahoo.com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ritical discourse of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1860-1935), drawing on her essay, “The Dress of Women,” serialized in the periodical, *The Forerunner: A Monthly Magazine* (1909-1916), published and written exclusively by her. In “The Dress of Women,” Gilman elaborated on the subject of women’s dresses to put forth her critical analysis of social, economic and gender relationship in modern American society.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Dress of Women” discussed and called for the reform of women’s dress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ts purpose went beyond the appeal of dress reform and to critique patriarchal manipulation of women in the society. In other words, Gilman’s ultimate concern was not only the reform of women’s dresses or the liberation of women’s bodies, but also their subjectivity and agency in social activities. Gilman explicated the evolution of women’s fashionable dresses and the mainstream gender ideology in modern American society, as well as evaluated the appeals and achievements of what she called “dress reformers.” This article will show that Gilman’s critical discourse might be too idealistic to put into practice, but what she proposed through her discourse on women’s dress, at least to a certain extent, had lifted the discourse on dress reform to a more comprehensive level, and thus motivate more reflection upon this subject.

Key Words: women’s dress,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The Dress of Women”, fashion, dress reform